

記憶

REMEMBRANCE



★ 天津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8年5月31日第14期 总第224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24期

天津专辑·地方文革（三）

【专稿】

杜钧福 天津文革述略

第一章 运动初期

1. 华北局会议
2. 十六中事件
3. 几所大学的造反运动
4. 红卫兵运动
5. 破四旧
6. 三轮二社事件
7. “八二六事件”
8. 工人运动的兴起
9.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0. 揪叛徒
11. “万张反党集团”

第二章 从夺权到革委会成立

1. “一月风暴”时期的混乱局面

2. 二月镇反
3. “五代会”成立和两大派形成
4. 武斗
5. 中央领导接见与革委会成立
6.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案件

第三章 革委会成立以后

1. “二二一事件”
2. “二二一事件”解读
3. 深泽县“揪叛徒”
4. 军管下的公安局
5.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6. “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
7. 从批陈整风到批林整风
8. 驻军占房事件
9. 江青和小靳庄
10. 1976年的风波

附录：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

【本刊声明】

【专稿】

天津文革述略

杜钧福

一、运动初期

有关天津市文革的文献甚缺，可见的一些材料也往往是单方面的，很难据之拼凑出文革全貌。官方叙述甚简单，对敏感问题避而不谈[1, 2]。比较全面记述天津文革的只有王辉的书《天津文革亲历纪事》[3]。王辉是前天津市委干部、小站四清经验上报材料的起草人。他的书和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有关文章[4-6]揭露了许多重要事实，而且看法颇有见地。虽然作者能较独立思考问题，但主要是从上层角度观察的，有一定局限。民间资料还有王林、王端阳父子的日记[7, 8]、造反派领袖林启予的回忆录[9]，以及一些工人造反派的回忆录。南开大学魏宏运教授关于南开大学文革的一些文章[10, 11]也是重要参考资料。南开《卫东》在文革期间编辑了一本南开文革的大事记《天翻地覆慨而慷》[12]，为原始资料，但只限于文革早期。此外，作家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13]（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虽为纪实文学作品，但对文革的实质揭露深刻，为其它史学材料所不及，一些内容也为本文所引用。

笔者写了三篇关于天津文革的博文[14-16]，均凭所见材料写成，可供参考。

华北局会议

天津原为直辖市，1958年应河北省方面要求，划归河北省，并将省会从保定迁移至此。后来很多天津市干部要求改回直辖市。1966年4月9日，河北省按照中央指示，决定将省会迁回保定，但是由于文革随即爆发，当时没能完全搬迁，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天津

算作省辖市。文革开始时，省委和天津市委约定，天津市委负责全市中小学运动，河北省委则管各高等学校。直到1967年1月2日，中央决定恢复天津的直辖市地位，天津才脱离河北省。[17]

在天津恢复市辖市过程中，陈伯达起了一定积极作用[18]。陈经常到天津调研，并指示市委就直辖市问题开座谈会，并把他们的意见转中央。陈伯达与天津的特殊关系还在于1964年，陈来天津市四清重点区域南郊区小站地区试点，抓了张凤琴等三个“反革命集团”，使小站四清成为与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并驾齐驱的另一四清典型[6]。在这次四清运动中，陈伯达结识了天津市一些干部，如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宣传部副部长方纪、公安局长江枫等。另外他和当时的天津市长胡昭衡有文字之交。这种关系可能影响到他对待天津以及河北省文革的立场。

我在文革期间曾听过小站地区西右营村四清积极分子鄧玉娥的报告，感觉三个反革命集团肯定是冤案，但是张凤琴在大跃进时期弄虚作假、虚报粮食产量也是实情。当然这也是当时农村干部的普遍情况。

就上层而言，天津文革始于华北局会议。按照中央部署，华北局从1966年5月21日到7月25日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工作会议。天津代表团在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第二书记赵武成、市长胡昭衡率领下共53人参加，留下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马瑞华、副市长杨拯民、市委秘书长李定在津主持工作。在这次会议上，内蒙古的乌兰夫、河北省的林铁被批判打倒。至此，华北局所属北京、河北、山西和内蒙四个省市区的领导人，只剩山西的卫恒了，因为彭真早已被打倒。从6月3日开始，又在天津代表团住处东方饭店召开市委书记处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市长胡昭衡，罪名之一是他写过一本类似“三家村”的杂文集《老生常谈》。会议在5月31日就下发了关于批判这本小册子的简报。胡昭衡的罪名之二是在1963年调天津前在内蒙工作，现在乌兰夫出了事，他自然跟着吃挂落。

6月6日，又开始批判市委宣传部部长白桦。21日后，开始批判河北省省委书记林铁。

他们在北京开这个马拉松会的时候，后院闹了起来。早在5月14日，天津市委宣传部分提出了文革的“四项原则”，即“大字报要审稿；不要上街；不要用文艺形式揭发问题；给省市领导提意见不要用大字报，不要点名。”[19]这些“原则”比后来的“中央八条”提出的限制还要严厉一些，传达后引起广泛质疑和反对。

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1966年6月1日晚上广播以后，天津市的许多大专院校和中学就于6月2日贴出了大字报，指责各校党委或党支部，并在以后几天愈演愈烈。

十六中事件

到1966年6月4日，全市中学基本停课，大字报贴满各个校园，全是攻击老师和学校领导的。6月5日开始，一些中学的校长、老师被戴高帽、挂牌子批斗、游街，有的身上还贴满了标语，脸上涂满了印油、墨汁。一中揪出了校长韦力，在全市影响很大。

和其他城市一样，干部子女在天津学生的造反运动中起了带头作用。一中是所干部子女集中的学校。写日记的王端阳当时是一中的学生，后来成为该校红卫兵领袖。他的父亲王林是天津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在十六中，即原来的名校耀华中学，天津警备区司令员朱彪的儿子朱强与几个部队干部子弟也给学校领导贴了大字报，攻击他们压制运动，受到围攻，一中的学生就去支援他们。6月7日以后，市委分别向十六中等校派出工作组，另一些学校原来的四清工作队改为文革工作队，但未能抑制造反热潮。6月8日，十六中学生自发选举成立了以胡昭衡市长的儿子李罗力为首的“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文化革命。他们不仅夺了党支部的权，而且使工作组无所作为，并在后来几天内贴大字报追究“四项原则”，逐渐将斗争矛头指向市委。[19]

6月13日，万晓塘从北京赶回天津，在体育馆给干部和学生做报告。6月21日，市委在民园体育场举行全市中学生庆祝废除高考制度大会。十六中学生当场向各校学生散发《致全市中学生的一封信》，批评市委、《天津日报》和主持工作的马瑞华。信中指出市委和北京市委一样，“存在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要求全市中学生团结起来，捍卫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事件后来称为“十六中事件”或“六·二一”事件。事后传达来自北京的省市领导的意见时说“学生背后有家长，青年背后有老年”[20]，意指胡昭衡是后台。其实当时李罗力并不知道他父亲在北京挨批，估计也没得到他父亲的指点。王林、王端阳的日记也反映他们父子思想上的差距。这种情形似乎和北京的一些老红卫兵表现有所不同。当然胡昭衡和王林其实都算文人，和军队干部家庭有所差别。

13日大会会场气氛已很紧张，在这前后市委已出动公安力量监视学生。当夜市委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对付办法，将这封公开信定性为“反党黑信”，要求严肃追查十六中学生“反党活动”的“幕后黑手”。但是十六中学生并未屈服，22日卢宗义、柴冠群等12人署名发表油印传单《为什么市委领导这样对待我们的革命行动？！》。市委动员各校学生前往十六中，与该校学生从当天下午3时“辩论”到次日晨5时。随后市委又派遣140人的庞大工作队进驻十六中，大造声势，宣布解散该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夺回学校领导权，并在后来几天里，动员很多中学生到十六中声讨“一小撮反革命集团”，将这个学校学生的造反活动镇压了下去。

省市委对运动的指导秉承华北局的指令。领导华北局的李雪峰当时很受毛泽东信任和重用，也能及时体会毛的旨意，从“五十天”镇压学运立场上转变较早。7月初天津市在传达李雪峰的指示时就说：“十六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但要密切注意反市委的动向。”[21]

从7月底到8月初，毛泽东回京后，文革形势陡变。8月3日，市委召开全市大专和中学文革积极分子大会，传达北京7月29日人民大会堂群众大会上的领导讲话，宣布撤销各校工作组。同日《天津日报》点名批判市委文教政治部主任王金鼎。“登报点名的当天，南开大学等70多个单位的上万人到市委门前集会声讨王金鼎。”[3]

8月6日，市委召开十六中和其他中学师生大会，有一万二千人参加，宣布支持十六中学生的“公开信”，并以镇压学生运动罪名撤销了马瑞华的市委组织部长职务。但是各校工作队迟至8月下旬才撤出，在这期间市委又向各校派出了“联络员”。8月20日左右，

河北省委要求三天内撤出工作队，但是天津市考虑到“待左派队伍建立后再撤出工作队”，在很多学校没及时撤出。[22]

8月10日，全市50多单位两万多人在市委门前集会声讨市委关于十六中问题的决定，群众认为不仅马瑞华，市委也应承担责任。[3]

从7月31日起在河北宾馆召开市委工作会议，又称“三级干部会”，参加的有市、区（局）、处三级干部976人。在会上胡昭衡为第一批判对象。白桦和作家方纪也受到批判。王金鼎揪出后，主管文教的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也受到批判。批判胡昭衡是华北局提出的，但未批倒，批判后他又出来工作。胡昭衡是文革前两年从内蒙调来的，因为是外来干部，只做些卫生之类的工作。他经常微服私访，在天津百姓中口碑很好。

这次市委工作会议一直开到8月底。会议期间，全市各学校各单位的运动开展起来，不断有干部被本单位人员揪回去批斗。一些领导干部下到各个中学控制局面。

几所大学的造反运动

6月2日，南开大学数学系于泽光等九位同学贴出针对校党委的大字报《这是为什么》，得到很多大字报响应，来势甚为猛烈[12]。省市委并没有向这个学校派工作组。这个学校的党委书记臧伯平本身兼任天津十三所高校文革领导小组组长。他向各系派遣工作组控制局面，围攻给党委贴大字报的学生，并在6月3日的总支书记会议上布置了要“横扫”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名单。次日，全校各系同时贴出1700份针对知识分子的大字报，抛出准备好的材料。学校绝大部分教师干部遭到这种有组织的炮轰。臧伯平组织了两个临时机构，利用四清运动材料制造一个以两个副校长为首的“何（锡麟）姜（平）黑帮”，在6月13日以大字报形式抛出，又列出这个“黑帮”的名单，贴出连篇累牍的大字报予以攻击。6月22日，他又拿历史系总支副书记李琛开刀，指使人贴出揭发她的大字报。这个李琛是前党委书记高仰云的夫人。高于两年前离职，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仍住在南开校园内休养。这一事件引起高仰云和臧伯平之间的矛盾。

臧伯平于6月底组织学校各级的“文革委员会”领导运动。7月29日这个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决定8月15日以前完成第一阶段战役，即完成对数学家吴大任教务长、历史学家郑天挺、文学家李何林、李霁野等几位全校重点人物的批斗。8月6日，臧伯平命其亲信研究次日批斗对象和批斗形式，并命各系上报批斗名单。8月7日，各系数十名著名教授、教师和干部在同一时间，以同样的方式，先批斗后游街，然后集中示众，受尽污辱，后被劳改，工资冻结。[10, 11]这一事件称“八·七开花”。开花一词并非事后所加，臧伯平等人在策划的时候就说要“全面开花”。

在同一日期，和南开大学毗邻的天津大学也爆发了同样的集体暴力行动。文革开始后，代党委书记苏庄将正在学校养病的已经离职前党委书记李曙森抛出，在《河北日报》上点名批判，并组织一些学生于8月7日把病中的李曙森与天津大学一大批领导干部、老师共40多人，强行抄家、批斗、游街。

在这两个学校里，也存在“五十天”的问题，一些给领导贴大字报的学生遭到监视、围攻，但是当政者的主要策略还是抛出知识分子和已不当政的干部进行批斗。

在河北大学，很早就成立“文革领导小组”，并将一位副校长抛出批斗。“停课闹革命”以后，集中斗教授、斗“黑帮”。然后，学校党委向各系派了工作组。工作组团结部分老师、党团员、班干部，制订“黑名单”，开始在学生里抓“右派”。“这样，以在黑名单和怀疑自己是黑名单上的，以及看着不公的同学和个别老师（大多数老师不动），为一方，与工作组及其所团结的师生为另一方，初步形成了对立关系，一个是‘造反派’，一个是‘保皇派’。”工作组撤走后，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几位同学煽动下，进“黑名单”这些人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而工作组信任那些人则成立了对立的“八一八”红卫兵。“八一八”虽在学校里是“保皇派”，但在社会上随大流反省委。主要原因是与其对立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领导是该校中文系三年级学生、省委书记刘子厚之女刘力理。中央领导号召干部子女退出群众组织领导岗位后，她很快退出。[23]

红卫兵运动

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两校的运动模式雷同，但是天津大学的代党委书记、副校长苏庄在该校资历较浅，没能建立有效的执行班子，而前党委书记李曙森在该校师生中有较高的声望。所以校方的倒行逆施激起学校广大师生的强烈不满。8月初传达北京人民大会堂各高校师生群众大会上首长讲话，8月8日公布“十六条”以后，一位杨姓同学给苏庄贴了大字报，遭到围攻，并被用铁丝捆起来殴打和囚禁。他逃往北京各高校求援。此事激起广大学生对苏庄的愤恨。在全校7000师生中，据统计反对者有4000人之多。从9日夜间起，在校园里开始辩论，一直辩到11日。[8]反对苏庄的学生于8月11日成立“八·一三”红卫兵，以纪念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视察天津。当天晚上，反对派几千名师生徒步进京反映学校问题，一直走到杨村。后中央知道此事，专门派两列客车迎接他们到京。当时的河北省省委书记刘子厚在北京接见了他们。“八·一三”红卫兵代表还在8月18日毛泽东接见时上了天安门。他们从北京回来后，要求省市委罢免苏庄。为此，他们于8月下旬连续几天到市委请愿。[24]

由于苏庄来校不久，后来学校内辩论的主要是李曙森问题。“八·一三”倾向结合李曙森，口号是“先辩后斗”。他们的对立面主张打倒李曙森，组成“天津大学红卫兵”，后称“九·一五”。

南开大学的造反派没那么运气。8月8日，在当日颁布的“十六条”鼓舞下，造反派组织游行，但遭到围攻。迫于校方的压力，他们于8月12日在临近的天津师范学院成立了“卫东战斗队”，简称卫东队，人数有几百人。他们的第一把手是周荣鑫的女儿、政经系学生周少华。在校方支持下，保守派的“八一八红卫兵”也于8月23日成立。[12]

8月中旬，北京市学生来津串联逐渐增多。在他们影响下，各大中学校纷纷成立红卫兵，一般是造反派先成立。按照市委指示“他们组织咱也组织，用搞串连的方法，发展左派。”对立的保守派红卫兵也在官方支持下成立，并将它们统称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后被简称“主义兵”。“大约在九月份左右，市里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23中的

红卫兵也参加了进去，从此我们就成了天津‘保’字号的保皇兵。所谓的保皇兵就是没有脱离开各级党组织，并在其领导下开展各项有组织的活动。为了配合市里总部的活动，有利于大规模地组织调动，各个学校分别组成了‘特务连’并集中住在学校，23 中的红卫兵团也在短时间内组建了‘特务连’。”这些红卫兵“有时会受到街道革委会的邀请参加清理街上摆小摊的人，并配合公安局的‘革命组织’几次清理‘反动组织’。”[25]有现在城管的功能。在十六中，属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系列的称“七一红卫兵”，军队干部子弟朱强为其的领导。[26]

派往各学校的工作队撤出后集中学习。8月30日市委在第一文化宫召开全市工作队员大会，市委第二书记赵武成在会上说“学校红卫兵要建立联络站，每区初中建立一个，完中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建立一个，大专院校建立一个，然后市里总的建立一个联络站，到那时各区里就叫做分站，工矿企业也要建立红卫兵。”[21]

于是各工矿企业也都由单位的文革办公室主持建立起了工人的群众组织，先称“毛泽东思想赤卫队”，后改称“捍卫毛泽东思想野战兵团”。全部是由各企业中的“优秀”产业工人所组成，全市共设了一个总部六个分部，如和平区是一野、河西区为二野、河东区为三野、河北区是四野、红桥区为五野、南开区是六野。

一般来说，造反派红卫兵也以“红五类”为主，初期主要在校内造反，至于造谁的反，有一些争论。王端阳的想法可为典型：“矛头不应是对资产阶级小崽子，而是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一斗、二批、三改。那些坚决反革命的小崽子必定是极少数，有几个也不足为奇，说老实话，我根本看不起他们，他们也兴不起大风浪，等时机一成熟，马上把他们镇压下去。”[7]

效仿毛泽东的八一八接见，省市市委于8月21日在民园体育场举行有60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万晓塘主持并讲话。会还没开完，有学生上台抢话筒，发生争执。此后红卫兵运动进入高潮。

破四旧



红卫兵运动首先是“破四旧”。在这个问题上天津市委实际上走在前面。早在7月22日，市领导就做出决定拆除八里台聂公桥旁即聂士成殉难处的聂公碑。

清理摆小摊的人成为“破四旧”的先声。在塘沽区，“红卫兵‘扫四旧’的炮火首先瞄准了全区1000多个个体小商小贩，当作资本主义活动予以取缔。”“文革”前全区共有小商贩、修

鞋、修表等个体经营者1075户。红卫兵向全区小商小贩发出“勒令”，“限8月23日全部停业，否则后果自负！”小商贩们慑于红卫兵运动的威力，只得被迫接受“勒令”，在限期内扔下了赖以生存的饭碗而全部停业。[27]

8月23日左右，红卫兵开始走上街头。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回忆录中写了他所见天津“破四旧”的场面：“我们遇到了红卫兵设的路卡，正在检查过往行人的着装。……只见那些红卫兵的手里拿着剪子、榔头等工具，对那些着装打扮不革命的人，采取着非常革命的行动：有的长辫子被剪没了，有的‘怪发形’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锯掉了，有的‘火箭鞋’被砸扁了……尽管这些人在和红卫兵讲理、央求，反抗，可是在‘这是革命行动’一词的压力下，无一幸免。”[28]

凡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统统是革命的对象，一律被取缔和砸烂。河北区改名为为了“卫东区”，和平区改为了“战斗区”，河西区改称“红旗区”，红桥区改为“红卫区”等并一直维持到文革结束。繁华的商业区和平路也被改名为为了“反帝路”，老店劝业场的牌匾摘下后，改名为“人民商场”。

23日，红卫兵涌到天津最大的天主教堂法国大教堂，批斗主教教士，焚毁圣物。（照片：王端阳博客）位于东南角的清真寺也被砸。一些学校焚烧图书馆里的“黄色书刊”，火光冲天。

按照王辉的说法：“1966年8月，天津开始进入‘红色恐怖’之中，开始是所谓‘地、富、反、坏、右’黑五类分子作为第一代‘牛鬼蛇神’受冲击，戴高帽子游街，被监督劳动。第二波是过去的资本家被抄家，他们的家里被任意搜索，财产被任意带走。当时各个学校都存放著大量的抄家物资，后来东西多了无法处理，在和平区新华体育场专门向市民卖国各类抄家物资。第三波是打老师，十分残酷。打老师是从北京传来的。被打的老师主要有三种人，一是学校负责人；二是业务强、有经验、教书教得好的老师，当时被说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三是个人有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有问题’的。”[3]

暴力行为从学校里发展到社会。一开始在学校里批斗老师和领导。一所作为批斗“样板”的中学里见到的景象是“偌大的操场好像在吊丧，若干长长的白色魂幡在晃动，幡下也是一片白色，‘牛鬼蛇神’们穿着丧服，敲着锣，转着圈，一片乌烟瘴气。”[29]

24日左右开始抄家。抄家的重点地区在五大道，是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集中居住的地方。抄家的主力首先是那些根红苗正的红卫兵，就是后来的“主义兵”，但是后来许多单位的人也开始抄本单位出身资本家的人的家。

“同学家的家什，被从楼上抛了下来，堆放到十字路口正当，被火点燃，也有纸簿，是帐本？是‘变天帐’？不得而知。反正都被点燃了，大火熊熊。同学的长辈们，都被逼迫跪到竿拨作响的火堆旁！那一幕刻骨铭心。”[29]

抄家伴随残酷暴力。十六中的教师范景娥，就因为丈夫是曹锟后裔，“在抄家狂潮中，她家附近的中学红卫兵打上门来‘索命’，当着十来岁



小儿子的面，把家中四口中老年妇女（包括一名老保姆）全部狂殴至死。”丈夫被关押在单位得以保全。[30]

暴力行为在8月25、26日达到高潮，25日各区成立红卫兵指挥部，27日以后逐渐向郊区蔓延。

一位家庭号称资本家实为房产主的儿童医院女医生回忆：“打26号到28号，天一亮到天黑，我和爹妈三口就给关在屋里拿皮腰带抽，头发全绞了，还一次次架到胡同口跪在地上批斗。不让你有一点闲着，来回来去地折腾，人不是人啦。如果有个地方躲躲就好啦，可躲到哪去？全市都在闹抄家，带出敲锣游街批斗啊，紧张死了，紧张到极点了，所以我们才不想活了。”结果她父母自杀而死。她因帮助父亲自杀而被逮捕，1968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冯骥才《我到底有没有罪？》[13]）

至于那些有“前科”的人就更是落入地狱。天津市年岁最小的一位“胡风分子”、在工厂里劳动的林希回忆说：“1966年的夏天，一天中午，突然一群人把握拉到工厂的大院里，不容分说上来就把我压到地上，然后几乎就是几百人一起踩我的身子，拳打脚踢，他们开始对我专政了。”[31]

一个孩子的记述：“1966年8月下旬的一天，天津铁路一中的红卫兵突然包围并占领了市工商联、民建的机关大院，扣押了所有在场的人员。那天恰好是学习日，平时不来机关的前资本家、现工商联和民建成员也按时到场，结果一网打尽。”[32]

天津工商联全体成员被红卫兵当场群殴。年届七旬的副主任委员、“面粉大王”孙冰如倒地毙命。秘书长车重远被枪托捣中心口，当场猝死。主任王光英因体格健硕仅以身免。[30]

这是张刃亲眼所见：“红卫兵打人真狠。我至今弄不懂，要怀着什么样的仇恨才可以下那样的黑手。令我没齿难忘的，是那些红卫兵痛打资本家车重远的场景。车重远并不是什么大资本家，当时约五十岁，胖胖的，人很和善，平时常与我们小孩子说笑，谁也想不到他会死于非命。红卫兵用棍棒打他，他起初并不吭声，后来开始哀嚎，惹得红卫兵不高兴了，愈发

打得重。终于,他被打出血来。也许是血腥冲激了兽性,那些人简直像疯了一样,不分部位地乱打。夏季穿着本来就少,衣服打烂了,露出皮肉。不知是不是铁器所致,那一下,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皮开肉绽,伤口外翻,渗出了鲜血。车重远没有了声息,直至不再动弹。一条生命就这样结束了。他是被活活打死的。” [32]

当时所有天津人都看到而且永不忘记的是,在这几天里,时时可见自杀和被杀人员的尸首在流经天津的海河上漂流:“1966年八、九月间,在红色风暴刚刮起来的日子,这位老大夫常常经过市区海河上的解放桥,经常看见有尸体从河面上漂过,如果站立的时间长一些,还会见到两具三具。他曾见过一对夫妻死后被打捞上来时,一条毛巾系住两人的手腕,以示生生死死永不分离,那情景让人伤心惨目……海河啊,祖国版图上有多少这样的‘海河’?‘海河’上又承载了多少这样的冤魂?!” [33]

“据不完全统计,从8月27日起至29日下午6时止,全市共发生自杀事件177起,死亡79人。” [3]没有打死人数目的统计,这个问题仍然讳莫如深。

据统计,到同年九月中旬,全市抄出的财物就达1.3万辆汽车,其中现金556万元,存款4050万元,公债261万元,黄金4万多两,金银饰品6万多件,银元60多万元。到67年3月底共查抄了64393户人家,涉及177569人。[34]

这些统计数字可能是指上缴的财物,实际上远不止此数。1968年1月24日王端阳日记披露了一些同学任意抄家的劣迹:“这些人运动以来,就借抄资本家之机,大发横财,抄手表、照相机、半导体、自行车,尤其是现款,几百元、几千元的抄,成天吃喝玩乐,每天都去大的食堂吃,用完了再去抄。” [7]这些人渣和强盗没有任何差别。

红卫兵串联时期,和平区某学校“为了解决被褥不足,组织红卫兵抄了几十户资本家,抄来几百条被子,附带抄了38辆自行车和两千元存款。” [3]

塘沽区的“破四旧”稍滞后:“9月9日 社会上刮起‘抄家’风,全区已查抄1352户,其中‘五类’分子580户、‘资本家’262户、‘黑六类’家属151户、小业主21户、‘重点人’47户、一般历史身份70户、其它人物221户。10月份查抄达到高潮,在20

天中，即抄工农商学等各界人物 3056 户，其中批斗游街 1125 人。”“全区‘文化大革命’中查抄房屋 636 间，包括清真寺 8 间，基督教堂 4 间，接受居民‘献房’ 6413 间。这些房屋绝大部分为街道办事处企业所占用，其中一部分由街道分给私人居住。” [35]

遣返老家的人数可见扬继绳的文章：“1972 年，我在天津市得到了主管部门的一个调查材料。这个材料介绍，天津市文革中以各种罪名开除公职遣返回农村老家的有 38000 多人。这些人有一部分在文革后期回到了城市，但名誉、住房、子女等一系列问题没有解决。全市重大冤假错案 371 起，大搞逼供信迫害致死 944 人。这些受害者在粉碎‘四人帮’后还没有彻底平反。只有 491 名职工的天津汽油机厂，文革中被抄家的就有 100 多名。” [36]

三轮二社事件

这一时期又发生三轮二社事件。因为风传该社支部书记陈良谋是汪精卫时代的“汉奸”，身负七条人命，在 8 月 29 日的职工代表大会上，部分工人将其和一些其他干部抓捕关押。陈良谋在批斗会上被工人和中学生红卫兵殴打于 9 月 1 日死亡。事后市委指示法院以“反革命报复罪”判处 12 名“打人凶手”死刑和有期徒刑，还就此事大做文章，组织 2400 个单位、49 万多人到该社追悼陈。在血腥的“红八月”里，“这时挨斗的对象恐怕最多还是所谓的‘牛鬼蛇神’，包括一些刚露苗头的造反派。当权派还是少数。” [37]陈良谋就是这少数当权派中的一个。至今无人统计海河里漂流的尸首的数目和他们究竟是那些人，却只有在同一时期被打死的陈良谋留下了姓名，至今被尊为烈士，并且有 12 人为此付出代价。原因就在于他的身份与众不同。 [15]

对于这件骇人听闻事件的起源，一直模糊不清。一则博文说：“据说，陈良谋由于阻止一些‘有问题’的人成立造反组织，那些人对陈良谋进行‘阶级报复’，将陈良谋打死。那些人有在文革初期受触及的人。陈良谋做为党的基层干部按照党的政策整了那些人，那些人在伟大舵手调整斗争方向之后，所以就要造陈良谋的反，所以陈良谋就成了文革的牺

牲品。”[38]所以很清楚，这位支部书记手下的工人于文革初期造反，要求成立自己的组织，遭到镇压，局势逆转后再次造反，并得到周围学生红卫兵的支持。所以这一事件是工人造反和红卫兵运动的合流造成的。工人恨这个支部书记，并流传他的谣言，学生红卫兵只管打人，于是陈良谋成了牺牲品。所以此事件有其必然性。“此后，在天津北郊的双口、塘沽石油站，又出现了类似三轮二社的事件。”[8]其中“塘沽石油储油所事件”有北京红卫兵参与。[27]

1967年4月7日周恩来说：“追出了八月底就有个三轮二社事件，坏人煽动红卫兵上了当，一个支部书记被冤枉打死了，也是市委鼓动几十万人去追悼，责怪红卫兵，实际不是向坏人示威，当时正是红卫兵冲击全国的时候，使中学红卫兵在那一次受到很大的压力。”[3]周恩来这一讲话也反映，天津市委高调宣扬此事，可能也有发泄对红卫兵运动不满的因素。

“八·二六事件”

8月中旬，北京“红旗中学”（估计是文革期间改的名字）一些学生来到天津市劳动局第二半工半读技工学校，鼓励他们造反。这个学校简称劳二半，编制中有许多工人，有生产任务，后来成为天津市文革中一所出名的学校。这所北京中学来天津串联的学生，据说其中有北京军区干部的子弟，领头的叫甄常华，化名孙大圣。

8月11日“十六条”公布后，20日副市长李中垣被市委派往该校宣讲。当时驻该校的四清工作队还未撤，学校形成工作队领导的职工代表会和学生组织“八一八”红卫兵对立的兩派。针对这种情况，市委决定暂不撤退四清工作队，并“迅速建立学校左派队伍”，于23日组织了500人的“赤卫队”，还派人到北京调查“红旗中学”来津学生底细。这个“赤卫队”为天津最早成立的保守派组织之一。[22]

25日下午，在该校开会宣讲“十六条”，李中垣遭到学生围攻。8月26日，该校学生和“红旗中学”串联来津学生200多人冲击市委大楼，称八二六事件。9月1日，市委开

会商量对策后，万晓塘于2日到现场接见学生，并在晚上应北京学生要求在这里进行了“公开辩论”。市委担心情况有变，甚至会发展为“政变性质”，先派劳二半“赤卫队”150人于辩论开始前赶到现场，又调集1000名工人到市委、500名到市人委，另调集公安局干部待命，调警备部队加强巡逻。调来的工人于3日凌晨进入市委大楼，将原先冲进大楼的几十名学生驱出。

这个辩论会持续了大约一个星期，曾选出哈尔滨一位学生任大会主席，说明秩序尚比较稳定。万晓塘参加了3日的辩论并讲了话。这在全国的省市委第一书记中还是比较少见的。

9月18日上午，天津市一中、十八中、女六中、劳二办等16所中学红卫兵和学生上万人，在民园体育场召开了首次揭批天津市委大会，赵成武和万晓塘先后作检查。为防止意外，市委派了几百名拥护他们的工人参加。但是没想到这次大会成为“文斗”的样板。事后万晓塘说：“这次大会开得不错，应当相信群众。原来我们想得很坏，心想一定很激烈。但会上很好，又给水、又给座。”[25]

可是，第二天，9月19日下午万晓塘因突发心脏病死亡。9月21日，经陶铸批准，新华社播发了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死亡公告。9月22日，市委为其举行50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他们散发以“人民体育场红卫兵、全体革命群众”名义写的《沉痛哀悼万晓塘同志——从九一八大会看万晓塘同志的革命精神》传单，攻击9月18日大会是“反革命大会”，认为是与会学生、群众“害死了万书记”。

同时开始对相关红卫兵组织进行压制。由于9月18日大会上，劳二办红卫兵不断递条子，自9月21日起组织人员在劳二半门前进行了空前规模的连续5天的围攻和声讨。他们贴大字报、发传单声讨该校八一八红卫兵，高喊“为万晓塘同志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同时许多单位炮轰市委的红卫兵和群众被围攻，有的甚至被禁闭。[25]

市委利用八二六事件、三轮二社事件和九一八事件打击造反派，暂时将造反运动压制下去。但是矛盾没能解决。一些被围攻的中学生红卫兵联合成立了“九一八造反团”，9

月23日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东风大学（天津师范学院）、天津纺织工学院等校的造反派联合成立“天津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出版发行《天津红卫兵报》。工人运动也开始兴起。

9月26日晚上，张淮三在天津四清工作团长会议上说：“形势越来越好。最紧张的一段是八月下旬和九月上旬，经过八二六事件的辩论，真像澄清了。9月18日，几十个学校又召开大会，揭发市委，晓塘同志亲自同学生见了面，讲了话，诚恳态度，欢迎批评，这样就争取了大多数，使会场形势有了很大变化。上午三千多人，下午只有六、七百人，发表意见也比较缓和了，极少数对市委有对立情绪的人，感到失望，觉得没劲。通过那天大会，形势逐渐变化。从9月20日到22日，广大群众吊唁晓塘同志，市委没有组织，但声势很大，实质是群众的正直行动，对坏人示威，对左派支持，市委被动局面好转。但要看到运动的阻力，还很大，斗争还会有反复，敌人决不会甘心失败，他们还会用各种手段破坏文化大革命。”[25]

工人运动的兴起

天津工人造反运动兴起很早，虽然受到学生运动的影响，但几乎和学生的红卫兵运动同步进行。工人组织后来成为天津造反派的核心力量。早在6月下旬，就有人观察到“工厂的工人的跃跃欲试，极力克制着，还有一触即发之势。”[8]

在各个企业建立官办保守组织做法实际上分裂了工人队伍，成为工人造反派兴起的重要原因。例如纺织局第三配件厂只有几百职工，但近年来有不少政治上活跃的复员军人进厂。官方组织保卫他们自己的赤卫队时，只吸收部分他们认为靠得住的职工参加，引起很多青年工人不满，因而形成了两派。一位复员军人董广发联合部分青年职工成立造反队，与赤卫队分庭抗礼。后来他和建筑业工人李勇一起，领导成立天津市第一支全市性的造反大军，称为“天津市工矿企业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造反总部造反大队”（简称“工矿企业”）。这个“工矿企业”和“捍卫毛泽东思想野战兵团”曾在第三配件厂发生武斗，是造反与保

守两派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冲突[39]。这个“工矿企业”要求给他们的组织刻公章，曾与副市长李中垣一起赴京请示[22]。

工人造反派的兴起也往往与文革初期甚至文革前的干群矛盾有关。在汽车运输七场，保养车间的工人陈风雨、姜玉江于6月初贴大字报揭发领导问题，遭到领导组织的大字报围攻，但未受到进一步迫害。1966年8月“十六条”颁布后，有学生来厂支持他们，反对领导的工人派人到北京上访后，于22日再次贴出针对领导的大字报，并于24日封了场里的广播站，成立了临时文革小组。这天晚上因交通局各公司领导来场，造反派工人找他们解决问题，临时召集了有串联学生参加的会议。会上他们同意造反派关于干部罢免的要求和次日召集大会。25日举行全场大会，辩论中双方激烈交锋，最后造反派取得胜利，两名不得人心的干部被揪出，市委干部代表市委肯定这次大会。此后造反派实际上已经夺得场党总支的权。

在这几天里，工人造反派始终得到周围学校学生特别是河北大学“八一八”的支持。但是，他们夺权后，在如何对待被揪出的干部问题上和部分来支援的学生发生分歧。其中七中的学生是干部子女“主义红卫兵”，他们“要求我们立即召开批斗会，并大声得意地宣扬他们如何打人。这些人一水的绿军装，挥舞着铜扣皮带，站在这场的大会主席台上乱跳乱叫，……”[34]结果这些学生还是在26日晚开了批斗会，打了人。陈风雨等到市委搬兵制止武斗却因市委门口发生“八二六事件”而未果。再过几天，北京的北大附中、人大附中的学生也来了。他们说，文革小组里不能有“出身不纯”的，于是陈风雨退出了领导岗位。后来他们在10月成立了“八二五造反团”。这里发生的事类似于三轮二社事件，但没打死人。

合成纤维厂（反修锦纶厂）是天津市重点企业。该厂一名工人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张承明因文革初期贴了炮轰厂领导的大字报，被进驻的工作队打为反革命。他和其他一些造反工人被停职，遭到大字报围攻。8月以后形势逐渐缓解，听说北京学生成立造反组织，张承明等人也在策划成立自己的组织。他带领百余人到市政府要求承认他们的组织的合法

性被拒绝，于是率领他的队伍徒步上京请愿。厂领导针锋相对，也派遣百余人的“消毒队”跟随前往进行反宣传。张承明等在北京的华北局等候几天之后，华北局的池必卿接见了他们并代表华北局宣布，已和天津市委联系，同意他们的组织是合法的群众组织，可刻公章。回到天津后，他们正式成立了工人红卫兵，是天津市最早的工人红卫兵组织。这对官方组织的“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是个沉重打击，引起该战斗队全体 780 人集体罢工并到市委静坐抗议，成为轰动全市的政治事件。面对工厂停工的危险，工人红卫兵自发加班加点，化解了停工危机，使他们的威信空前提高，队伍迅速扩大到 1000 余人。为了协调造反派的行动，他们又和厂里其他造反组织以及附属技校的红卫兵联合成立“红卫兵联合指挥部”，简称“红联指”[40]。从这个例子可知，由于造反派在初期主要反对本单位领导，又由于李雪峰领导的华北局的宽容态度，天津工人运动在 1966 年夏天就得到初步发展。

后来成为工代会头头、市革委会常委的林启予是天津大学毕业的电业局发电设备检修大队的实习技术员。他的师傅是班组长，因占小便宜在四清运动中被审查已经得出结论，但是在文革开始时候又挨整。他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十六条”精神，就贴大字报表示反对，后来这一争论演变成全大队的辩论。到了 10 月，天津大学学生来串联，支持他们的观点，帮助他们成立了造反派组织。林启予后来成为电业局造反联合总部的第二把手。[9]

电车公司的工人高崇瑞出身贫苦，“解放”后被培养成为《工人日报》特约通讯员，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打击，文革开始后又被关进牛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开展后，他写了 17 张大字报再次反抗，被“文革小组”指使纠察队抓了起来。后来大学红卫兵把他救了出来，也冲垮了“文革小组”。这些造反的工人就成立了“电车红旗”，是天津工人造反派的一支主要力量。[13]

北京“三司”在天津机车车辆厂设立了联络站。他们主要是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鼓动该厂工人成立“京津红卫兵铁流纵队”，成员达一千多人。[41]

到 1966 年 11 月初，在天津已有 100 多家工厂成立了造反组织，11 月中达 200 余家。
[22]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966年10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天津市的文革进入新的阶段。

南开大学的造反派“卫东”的地位逐渐改善，得到一些干部的支持。9月中旬，哲学系总支书记郭毅用党总支公章给“卫东”开介绍信调查臧伯平历史问题，被臧收回公章。10月4日至5日，“卫东”人员包围行政楼索要公章，和保守派发生冲突，最后将公章追回，此事称为“十五事件”。[12]

10月6日，北京市召开“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南开大学周少华代表“天津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在会上发言。10月11日天津造反派近3万人举行“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

在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传达后，造反派立即开始向各级领导部门追索运动初期整群众的“黑材料”。在南开大学，从各系党总支和文革办公室追索出一些“黑材料”后，又于10月11-12日派遣队伍到市公安局追索出将学生打成“反革命”的专人材料和“敌情简报”。

南开大学“卫东”在11月举行“红色暴动”，即他们以后所称的“第一次夺权”，但是由于保守派势力强大，只夺了“牛鬼蛇神劳改队”的权。一位南开大学教师J回忆这段历史，他称“卫东”为“捍东”：“冲垮了原来的那些行政组织系统，最主要的似乎就是接管了牛鬼蛇神的管理——把他们全放了。让他们回单位参加文革运动。有的原来的‘牛鬼蛇神’只要不被‘捍东’队认为是牛鬼蛇神的，还参加了‘捍东’队的活动。实际上也成为了革命群众。”“这件事以及可能还有的一些其他的事情，使得J以及像他类似情况的人，以及当时的牛鬼蛇神们都对捍东队有好感。”“捍东”队坚决造学校党委的反，但是对于市的领导的态度内部有很大分歧。[42]

在天津化工研究院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革命的风向便转变了，红卫兵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热火朝天。党委和院级处级干部统统下台

挨斗，甚至基层的整人专业户支部书记们的日子也很难过，他们成了斗争的对象，却把我们这帮牛鬼蛇神、黑五类放在了一边。于是，我们倒成了逍遥派。那时我在天津化工研究院工作，由于没有人管，可以到处游逛。十分惬意。”[43]

南开大学造反派的夺权虽未成功，但是经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队伍从200余人壮大到2000余人。保守派“八一八”内部也有人开始造反。10月底、11月初，南开“卫东”和天大“八·一三”还组织队伍到保定支持那里的造反派。[12]在天津工学院，到10月底，全校4000多学生中，造反派“八·二五”红卫兵占1400多人，连同他们的“红外围”或称“红战友”共3000多人，后来成为“大联筹”的中坚力量。[44]

中学的情况要差一些。天津十六中的劳改队成立于文革初期，于1966年初冬解散，1967年秋再次成立。[45]。在一中，直到1967年校长韦力还在带领20多个老师职工组成的劳改队被迫劳动，虽然比运动初期经常遭受批斗好过一些，但仍不免遭受各种侮辱。[46]

从抢夺“黑材料”和解散劳改队来看，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区别是明显的。造反派代表了弱势阶层的利益。但是由于天津大专院校的运动由省委领导，省市委均未派遣工作队，对造反学生的镇压是各校党委执行的，“卫东”这样的大学造反派主要在学校里和保守派“保臧七军”斗争，在对待市委的态度上内部有分歧。在高校造反派中，以天津工学院“八二五”最为激进。河北大学的“八一八”本来就是保守派。据林启予分析，当时天津以大专院校为龙头的“造反格局”有三个“山头”，分别以“卫东”和“八·一三”、“八·二五”、“八一八”为代表，工人运动分别向他们靠拢，已有分裂的趋势。

11月6日，中学造反派红卫兵也成立了“天津市中等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但是内部也存在分歧。刚成立不久，劳二半“八一八”就宣布退出。

李中垣说：“万晓塘去世后，天津市的形势急转直下。”[22]除去大中学校外，机关干部也起来造反。11月3日，市委公交政治处干部巴木兰、刘逢久、吴增盛写了一张大字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继续——8月15日至9月26日大事记》，对于天津市委怎样组织“工人赤卫队”对抗红卫兵，以及怎样组织群众斗学生的经过，揭发甚详甚具体，影响

很大。[8]巴木兰后成为市委机关群众组织“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市委联委”）的领导人。[3]后来市委宣传部《支部生活》编辑部部分革命干部写了大字报《天津市委压制打击革命群众运动的十根棍子》，揭发天津市委在文化、文艺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幕。[8]

公安局内也出现了造反派。当时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的学生来此串联，鼓动公安局人员造反。于是局内造反派也成立了“政法公社”，并与社会上“卫东”、“八一三”学生造反派发生联系，反对局长江枫。而保江枫的人则成立“公安造总”。10月底，公安局两派斗争激烈，张怀三为此专门召集秘密会议研究如何处理。

揪叛徒

天津红卫兵，特别是南开大学的红卫兵，以“揪叛徒”在文革中著称于世。所谓“揪叛徒”主要指“六十一人”问题，即1936年被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的六十一名共产党人，根据中央的安排，在办理了一定的手续之后出狱的事件。这个“抓叛徒”事件既是打倒刘少奇的部署之一，也是实现“全面夺权”的一个重要步骤，使很多负责干部受到诬陷和严重的迫害，是文革中的重大事件之一。

作为这一运动的正式启动步骤，1967年3月16日，中央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六十一人的自首叛变材料》，将这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在该文件的批示中说：“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揭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0余人的叛徒集团。这些叛徒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揭露这个叛徒集团，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文件还说：“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这些变节分子出狱后，由于刘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们安插在党、政、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成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正如这个文件所说的，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就已经揭发出这个“集团”的问题。这一揭发分为官方的专案和群众组织的调查两方面，互相配合。官方的专案，如1966年8月份，康生让彭真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调查六十一人问题。群众组织方面，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的活动为代表。由于这六十一人中的尚存者，都是在职的党政重要干部，官方乐于红卫兵走在前面。

南开大学相互对立的两派红卫兵，保守派“八一八”和造反派“卫东”，在这场“抓叛徒”的竞赛中都非常抢眼，立下了“很大功勋”。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天津的红卫兵呢？

在南开红卫兵中，“八一八”在“揪叛徒”中立了头功。这和南开园中两派斗争有关。当时“八一八”拥护臧伯平，反对高仰云，“卫东”则持相反立场。“八一八”要打倒高仰云，自然处心积虑要找他的毛病。这个毛病找到了，原来他在历史上是“叛徒”、“六十一人”之一。找到高仰云这一罪证以后，他们进而“立新功”，开始揪“六十一人”中的其他“叛徒”，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揪叛徒”运动。

这一群众性“揪叛徒”运动和中央的意图吻合，据说起始于1966年9-10月。是谁启发了他们，并给他们开绿灯去查档案呢？

1966年9月13日周恩来接见了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二司”全体人员，还有外地红卫兵一千余人，发表了谈话。事后，周恩来在1967年1月13日接见了南开大学“卫东”、天津大学“八·一三”、华北局“卫东”五位人员时谈到南开“八一八”：“‘八一八’也做了点好事，调查集体自首是他们首先搞的。那时我对北京第二司令部谈话时，‘八一八’也在那里，那时他们很坦率，有马骏的孙子，他们承认他们是保守的，他们说他们开门整风。”

一则回忆录披露[42]，周恩来就是通过当时为南开物理系学生的马骏的孙子传达了中央“揪叛徒”的意图，从而使南开“八一八”开展了这项活动。这也说明，为什么只有天津的红卫兵干这件事。南开大学是周恩来的母校，回族革命烈士马骏是周恩来在天津《觉

悟社》时期的战友。周恩来这样做是说得通的。周显然是赞扬、支持这一行动的，由他来启动这一群众性的调查是可以理解的。

“八一八”马上行动，一方面查资料，主要是旧报纸，一方面到北京突击审讯杨献珍，打开了缺口。到了10月，他们基本上摸清了事情的脉络。11月1日，他们给中央递交了一份“请示报告”，并附有从旧报纸上抄下来的高仰云“反共启事”。几天后，他们又给周恩来写信汇报说：“根据占有材料看来，这伙叛徒多属‘高干’，职位很高，权力很大，根子很硬，涉及面很广，危害甚大。因此，我们建议党中央立刻成立专案组搞这个问题，我们协助党中央坚决把这伙叛徒铲除净尽！”11月9日他们在南开园贴出大字报《看！高仰云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叛徒嘴脸》，和《告全国人民书》，并开始揪斗高仰云夫妇。他们继而“寒天风雪月，三审张闻天”。后来，“八一八”的贾淑琴12月29日叙述他们抓叛徒经过的报告《彻底砸烂刘少奇叛徒集团》流传全国。

南开的造反派“卫东”因为保高仰云，处于比较被动地位，于是和高仰云切割，并且马上也行动起来，在其内部寻找通天线索，最终在历史系找到一个康生的亲戚，于是通过此人与康生挂上钩，也得到了尚方宝剑，和“八一八”展开了“抓叛徒”的竞赛。

但是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这里面还有陷阱。1967年5月初，南开“卫东”派人到保定查阅旧报纸，发现1932年的报纸上有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他们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后，对此很重视，将启事抄件派周少华、张国忠两人专程送到北京。

5月12日，周少华写信给戚本禹报告此事。5月13日，戚本禹和关锋一起与周少华、张国忠两人谈话并将抄件取走送与江青。5月18日，江青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康生，说：“5月12日夜，收到周荣鑫的女儿周少华（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给中央文革来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5月19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写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居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当天，周恩来调阅了上海各旧报，给毛泽东写了

一封信，并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给毛泽东。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47]

这就是事情的经过。后来，关于“伍豪”的材料，又通过其他途径向中央递送过。但是看来，南开“卫东”是始作俑者。

戚本禹垮台以后的1972年8月3日，周恩来与李先念、纪登奎、汪东兴约周荣鑫、周少华谈话，询问了1967年天津红卫兵发现这一启事以及抄件送戚本禹的情况，并要周少华就此事经过情况写了一个材料，即《汇报我和张国忠通过戚本禹向中央报告国民党反动派捏造总理黑材料的经过》。之所以约周荣鑫父女一起谈，是视周荣鑫为当事人之一，应承担相应责任。按照一般道理，周少华这样做也不能不告诉她的父亲。

“万张反党集团”

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在1966年9月19日病故后，当时风传他是自杀的。他死后，中央一直未任命新的第一书记，因而市委陷于半瘫痪状态。

10月9-28日中央举行工作会议。会上中央领导对天津市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批评，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做了检讨。会后，天津市委于11月4-22日举行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但是在应由什么人传达问题上发生争执。参加中央会议的第二书记赵武成因病不能与会传达，他指定当时主持工作的书记处书记谷云亭传达。但是因中央点了胡昭衡的名叫他参加中央会议，回来后，他认为应由他传达。结果是胡昭衡传达。与会代表集体向中央写信反映了这种情况。[48]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于10月24日说：“对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天津万晓塘死了以后，开了五十万人的追悼会，他们也认为这是大好形势，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这一讲话否定了天津市委，也否定了万晓塘，天津市委的威信更加一落千丈。但据王辉的说法，“死人压活人”一说，不仅指万晓塘事情，也指三轮二社事件。[3]

在文革开始时的华北局会议后，天津市委在河北宾馆召开工作会议批判胡昭衡。在会议期间，公安局长江枫贴大字报揭发市委常委张淮三是叛徒。这个问题在1955年肃反时就已经审查过并作出结论，江枫是当时的审查小组成员。当时也有大字报为江枫辩护，万晓塘也批评了江枫的做法。万晓塘于9月19日去世后，江枫根据在万的住处搜出了几个药片断定万为自杀，使其落了个“叛党自杀”的恶名。江枫可能通过陈伯达将这些问题反映到中央。江枫等人在12月7日以革命群众名义贴出“炮轰天津市委，火烧万晓塘”的大字报，提出“以万晓塘为首的宗派集团”。1966年11月29-30日，华北局书记处专门讨论了天津文革问题，指出“天津市委半年来贯彻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一中全会以后有了发展。”明确指出“万张反党宗派集团”问题，决定张淮三离职反省，12月将其秘密调至山西太原软禁起来予以审查。（谢燕《江胡王方李冤案》，《天津老年时报》）12月29-30日华北局书记处专题讨论天津文革，指出天津市委半年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提出“万张反党宗派集团”问题。1967年4月10日，中央将天津市的驻军代表、群众代表和干部代表召到北京，向他们宣布天津市文革要打倒的主要对象是以万晓塘、张淮三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所以这个“万张集团”应是党内宗派斗争的产物，不是造反派揪出来的，正如王辉所言“万张集团是江枫揭发的，陈伯达采纳的，周恩来同意的，当然最后要经毛泽东批准。”

“万张集团”案影响深远，天津全市局以上干部有80%以上被揪斗和关“牛棚”。李中垣分析，此案的成因和天津市与河北省之间的矛盾有关。[22]

从干部派系分析，天津市的干部来源复杂。“解放初，天津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有冀中的，有城工部的，也有不少人来自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还有一些干部源于山西如李中垣。王辉分析说：“天津解放时，江枫属于来自于晋察冀社会部和冀中公安局的那一部分人，他们主要负责政治保卫工作；市委书记万晓塘带着来自于冀鲁豫公安局的一些人，主要负责经济保卫工作。据说两批来自于不同山头的人马，过去就有矛盾，可是人们都得按组织原则行事，相安无事。”[3]文革中发展为对立两派。张淮三从1945年就被

派往天津做地下工作。由于他在1948年被捕过，又与被打倒的刘仁（原华北局城工部长）有联系，不但自己被打倒，还株连一大批地下党，和全国其他地区所发生的事情类似。

追溯文革初期，省市委未向大学派工作组。大学里的造反派主要和校内当权派和保守派斗争。如南开大学造反派的材料[12]主要记述如何与官办“保臧七军”的斗争。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被批判后死亡，同情者都异口同声谴责劳二半“八一八”，没有大学造反派的事。所以作为文革主力的大学造反派对市委的态度有分歧。这也是造反派与“万张集团”案关系不大的另一原因。

二、从夺权到革委会成立

“一月风暴”时期的混乱局面

1966年下半年，天津市委群龙无首，勉强维持。到了1967年初，为避免造反派的干扰，他们东躲西藏，只能秘密接头和开会。陈伯达曾自荐到天津工作。但是中央最后选派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解学恭到天津接任。1月2日，中央决定天津恢复直辖市的地位，解学恭为市委第一书记，原河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阎达开为第二书记。1月4日，在民园体育场批判张淮三的群众大会上，胡昭衡宣布了中央的这些决定。但是由于河北省的问题，阎达开未到天津就任。

文革开始后，李雪峰代替彭真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但是也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受到批判。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批准了他的检讨，并让他到天津筹备天津市的革命委员会。他在此工作到1967年4月，但当时身份不很明确。

1966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告诉解学恭，中央准备派他去天津工作。他在1966年12月初就已经到天津赴任[22]。和山西的刘格平不同，他没有夺权的任务，只是要组织新的领导班子。但是在1967年1月，上海发生的“一月革命”影响到全国。天津市继而也在各级政府机构和单位内部发生夺权运动。

南开大学“卫东”在1966年的10月的“第一次夺权”未能成功。他们在上海“一月革命”影响下在校园内进行“第二次夺权”。由于保守派的拼命抵抗，这夺权进行得异常艰难。最后周恩来在1月13日指示“卫东”对“八一八”要“分化、教育、争取”，致使“八一八”和该校其他保守组织于1月中旬宣布解散。[12]

在河北大学，校内保守派“八一八”在社会问题上持反省市的立场也顺乎潮流成了造反派，在一月夺权中夺了学校的党政大权，并占据了该校的马场道校区。真正的造反派“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则占据了靠近南开、天大的八里台校区。[50]

在市内夺权上，造反派内部也进行了讨论。一些人主张先夺权，后争取解放军支持。另一些人主张先联合，再夺权。但是在一些机构的夺权问题上，和北京一样，造反派起了内讧，但阵线比较混乱，未形成对立的两大派。

1月15日，天津大学“八·一三”、南开大学“卫东”和“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即“大专”）发生矛盾，后来宣布退出“大专”。15-16日，“八·一三”、“卫东”联合“工矿企业”到《天津日报》社、广播电台和市公安局夺权，引起其他造反组织不满。兼之“八·一三”不久前有联合中央党校、清华大学等校组织炮打康生的前科，于是掀起一股反对“八·一三”的浪潮。1月28日，“大专”、劳二办“八一八”等25个造反派组织联合发表《就天津市文化革命形势告全市人民书》，要求他们退出这些机构。[7] 来津的北京学校各大造反派也支持他们的立场。

此间还发生一个“反对经济主义”的问题。据李中垣回忆，1967年1月有迁往山西的色织五厂返津造反组织要求迁回天津。还有个“六五届大专毕业生造反组织”也来找他。按1965年有一批大专毕业生没在当年分配，称为“储备生”，他们自称“老储”，可能就是这批人在争取他们的利益。[22]在反对经济主义运动开展之后，造反派红卫兵到各大商场查封高档商品。有些红卫兵还要封闭三大商场，遭到拒绝，没有成功。天津这个反“经济主义”运动搞得没什么声色，原因是没怎么发现抢购高档商品这类“经济主义”事件。

1月14-15日，85个工人组织、学生红卫兵，以及北京群众组织驻津联络站仿效上海，

向市委连续发出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紧急通令》和《紧急通知》。但是这个通知遭到合同工临时工组织“反修战斗团”的反对，为此砸了《天津日报》社。[7]在一些企业中，听到1966年12月江青等人接见“全红总”的讲话以后，已经准备给这些合同工临时工转正，可是这一反经济主义就全吹了。这一组织虽受到各界排斥，但是也存在了很长时间。

1967年初，在陈伯达搞四清的小站地区，也成立了要翻四清案的“巴黎公社”群众组织，有几万群众参加，得到市公安局造反派“政法公社”的支持。市委王亢之、方纪等人指使河北大学“八一八”等组织成立“南郊区捍卫六六通令联络站”进行弹压，并和南郊区武装部长一起主持南郊区工作。[51]

谢富治接见政法学院“政法公社”代表时的讲话也谈到此事：“政法公社燎原长征队，在西右营翟子地，结果支持革命派（原大队四不清干部）‘巴黎公社’与贫下中农造反派对立，说什么‘四清是一条黑线，不搞清我们十几个人就不走’。在这些学生支持下，‘巴黎公社’夺了公社的权，斗争了公社书记王凤春。政法公社在批判王凤春时说：‘你们保卫陈伯达，还保卫毛主席吗？’你们这样搞行啊？搞了70天，明明是调查陈伯达同志材料’。”[52]

另一说是在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四清的下台干部在北京政法学院的“政法公社燎原长征队”支持下，成立造反组织“星火战斗队”，翻四清的案。中央文革记者站为此写了一篇短文报道，被毛泽东阅圈，认为是反革命复辟。[53]

军训和延安中学经验

1967年2月4日和19日，中央先后发出通知，要求中小學生停止串联，一律返校，边上课边闹革命。但当时全国中小学秩序混乱，一时很难恢复上课。

早在军队介入之前，天津驻军就已经对学校学生开展军训。1967年1月4日，天津市驻军军训联合指挥部成立。主要负责人为66军军长郑三生、副军长衣瑞伦等[54]。在军训过程中，他们在郊区的延安中学总结了一套经验《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

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55]，这个经验，概括地说，就是解散战斗队，学生们回班复课。但是，这不意味着解散红卫兵。“在整顿和发展工作中，贯彻了党的阶级路线，已发展的五百二十名红卫兵中（占受训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二），劳动人民子弟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红卫兵整顿后，战斗力大大加强，已成为全校复课闹革命的一支先锋队。”

在这一整顿中，原来的主要造反组织“毛泽东思想造反兵团”的一些人反对这种做法，说是“和稀泥”、“大杂烩”，扬言要上京告状。被批判为“山头主义，风头主义，个人第一主义，是束缚自己思想不能得到解放的枷锁，是当前革命派大联合的主要敌人。”

对于原来的保守派，报告说：“‘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运动中受了血统论的影响，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其它战斗组错误地把‘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视为主要批判对象，先后将‘红卫兵’连部抄、砸十余次。在学习中，大家深刻地懂得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道理。‘造反兵团’的战士们说：‘对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要一分为二，既要看到他们现在的缺点，又要看到他们在运动初期横扫四旧的功勋；既要看到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又要看到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从这个报告可以判断，官方认可的血统论红卫兵的主要“功勋”就是“破四旧”。

这套经验，军训人员于3月初上报66军，军长郑三生用电话向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作了汇报。郑维山当即表示支持，并利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会机会上报周恩来，周命令写个报告递上。这个报告于3月6日发出，3月7日毛泽东便在报告上写下批语，后称“三七批示”：“林彪、恩来、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与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做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

于是，延安中学成为全国典型，天津召开万人大会庆祝此事。3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3月19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联的通知。全国各地中学也先后搞起了“全校大联合”。

“二月镇反”

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联合发布《解放军支持革命左派群众》文件后，军队正式介入文革。

正如毛泽东所说，军队其实早就介入文革。除去对中学生军训外，1月18日，天津驻军队本市58个仓库、电台、监狱、工厂等重要目标实施军管和警卫。也在这一天，在群众组织冲击下，天津市委完全解体。[3]

1月23日，天津驻军奉命进行“三支两军”工作。1月29日，驻军接管《天津日报》社。2月8日，天津警备区根据“公安六条”宣布取缔一些群众组织，将这些组织定为“反动组织”。

2月13日，天津驻军接管公安局。他们是怎样接管的呢？“到晚9时，有一部卡车，上有战士20余人，车项上架着机关枪，从体育场来到隔壁的公安大楼门口，停了下来，这时早已等候在公安局附近的解放军战士，以整齐的步伐进入公安大楼和其他指定地点，未过三分钟，就听到大楼内多处传出：‘举起手来不准动！’、‘举起手来，不准动！’的大声呼喊声。同时楼内所有电灯一律打开，一片通明，从窗户里可以看到，许多公安干警被逼到墙边，面向墙壁，高举双手，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经过战士们搜查，带枪的人，把枪放在桌子上，才使大家坐在房间里，但不许外出，不许回家。”[34]这个动静，可能比当年共产党接管国民党的警察局的时候还大。

在“一月革命”里，天津市公安局由公安系统的“政法公社”联合社会上“卫东”、“八·一三”等学生造反派组织夺了权。现在，驻军在接管公安局时，宣布“政法公社”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并宣布原副局长王诚熙，二处处长张露、二处副处长张剑飞、政

治部副主任米力等九人为“政法公社后台人物”予以拘留审查。被拘禁的公安局长江枫被解救出来。公安局里和他一势的“公安干警造反总部”（“公安造总”）取得胜利。张露是已去世的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的妻子，而江枫是揭发“万张集团”的功臣。所以公安局两派斗争的后面确实分别有“后台人物”支持。但是江枫揭发有功，应该算造反派，为什么社会上的造反派却支持他们的对立面“政法公社”呢？因为江枫一派虽然在市里问题上造反，但在局里是当权派。他们反市委，是党内宗派斗争，和学生娃娃的造反不是一回事。

2月18日周恩来说：“天津公安局的问题就更严重了。局内有一小撮反动分子实行假造反，结果破坏了整个社会秩序，连交警也撤了，但天津的广大人民群众很好，并未出什么大乱子，但这局面究竟不能长久，最后只好实行军事管制，……。”[56]

天津驻军否定了公安局的“政法公社”，但是对和这个组织一同在公安局夺权的著名学生造反派“卫东”、“八·一三”却放了一马，把他们“解脱”了，只是叫他们和工人组织“工矿企业”“整风”。所谓“整风”，就是转变立场，叫他们在这场“二月镇反”里，采取支持驻军的立场。

2月29日接管公安局的解放军发出第三号通令：取缔一切反革命组织。未解散的保守派组织“野战兵团”上街游行表示拥护这一通令。

南开大学保守派也受到鼓舞。3月16日，原保守派以“八一八红卫兵革命委员会”名义发表声明，重新拉起队伍。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双方冲突不断。12月18日双方发生激烈武斗，“南大卫东的人把南大八一八的办公楼给围了，断水，断电，把人也给打伤了。”[9]陈伯达、郑维山赶来处理。

在河北大学，驻军支持原为保守派、继而造省委反的“八一八”，引起波澜。和“八一八”对立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未得到驻军支持，致使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退出。其余成员将这一组织改名“井冈山”，后来成为“大联筹”中的一支主要力量。[57]

驻军对其他工人造反组织可没那么宽大。3月2日，两卡车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开到汽车运输七场，集合群众组织负责人当众宣布“八二五红色造反团”有些活动不符合“十六

条”和军管会通告，因此要他们遵守宣布的七条，包括是“不受欢迎的组织”。之后，这个组织的五位领导人即被对立组织拘押审查，失去自由。天津大学“八一三”曾支持这个工人造反派组织，但是当驻军做工作后，他们又返回运输七场，在血统论问题上贴大字报攻击造反派，说他们继承了彭真的“阶级路线”。[37]所以这个军管，基本上是血统论的回潮。

与河北省和其它北方省市一样，天津也有一个“回民支队”问题。天津北郊的天穆村是个回民聚集居住的地方。文革初期，根据上级指示，成立了以村支书和派出所所长为首的“文化大革命总指挥部”。在他们指挥下，于1966年8月24日查封了清真寺改为总指挥部所在地，并成立了文革小组。他们继而在25日对村内40多户人家抄家并讲部分被抄家群众游街示众。9月初，村里的阿訇也被游街。9月2日，因天气渐冷，一些被抄户聚集总指挥部门前要求归还生活必需品，僵持至深夜，称为“九二事件”。[58]

笔者曾于文革前到京郊马驹桥回民村劳动，知道清真寺是全村回民活动中心，村民也在此洗浴。封闭清真寺给村民带来很大不便，而且强迫养猪也激起回民反抗意识。他们造反的缘由与社会上造反有所不同，但节奏基本与社会造反同步。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开展后，斗争锋芒有所改变。在这种局势下，天穆村一些青年于12月成立“毛泽东思想造反派”，后又更名为“毛泽东思想造反总部”，批判封闭清真寺违反党的宗教政策和民族政策，并先后四次向村、公社两级领导提出归还清真寺等要求。另一些群众又成立的相同观点的“回民支队”。其对立方则成立了“真理队”，形成两派对立局面。

“回民支队”成立后，就和其他地区的类似组织一样，向周边地区发展，天穆村成为这些组织的总部。他们还派人到其他区县支持当地回民维护自身权益的斗争，这就不可避免地 and 中央的方针发生冲突。1967年2月3日，他们派人到沧州地区孟村回族自治县的人员被扣押。4日天穆村总部派遣百余人乘七辆汽车去孟村解救，也被军队全部扣留。2月8日晨四时，驻津部队包围了天穆村，宣布“回民支队”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这一组织和“毛泽东思想造反总部”（后改名为“九二战斗队”）领导人遭到长期迫害。

“五代会”成立和两大派形成

据林启予回忆[9]，军队介入后，就筹备群众组织大联合。第一次在天津宾馆讨论，参加的有林启予、天大的杨长俊、南开的于泽光，反修锦纶厂的张承明、劳二半的郭长年、河大八一八的张崇俭、新冶金的王洪章、公安造总的侯振江、干部代表巴木兰。参加的还有三位地方领导解学恭、江枫、胡昭衡和三位军队领导郑三生、杨银生、肖思明。会后，找了全市28个单位或系统的造反派组织，在民园开大会，张承明为执行主席，宣布全市造反派组织大联合，然后由军队开道，在和平路举行大游行。

3月3日，根据周恩来指示，又在天津宾馆开会，成立天津革委会夺权筹备小组。参加的有32个单位代表。高等学校有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和天津体育学院。增加了农民代表，激进的天工“八·二五”被排斥在外。

会上宣布成立天津革命委员会夺权筹备小组，筹备小组由15个人组成，军队领导三个名额，地方领导三个名额，群众组织代表九个名额。群众代表由出席会议的38名代表选举。选举结果，三名工人代表中没一名真正工人，反修锦纶厂的代表张承明落选。

张承明是工人、党员、复员军人，又是最早造反的，又是全市三结合亮相大会执行主席，应是当然的代表，却没能选上。原因是市里派他和部队人员一起到山西将张怀三解回天津后，就关押在他们的反修锦纶厂。但是据说张承明对这个“走资派”很好，“好吃好喝好待遇”，也不交群众批斗，被南开、天大的学生造反派揭发，会议代表都知道了此事，张承明自然就落选了。后来康生在接见天津代表时说：“看来选举不如协商”，此事件直接影响到中央文革对直接民主的看法。

周恩来在3月又指示：天津市要做一个试点，成立五代会，即：工代会、干代会、农代会、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大联合。首先酝酿成立的是工代会，林启予为筹备组组长，吸收张承明为副组长，但是在确定工代会成员单位时发生争执。当时的六四一厂，就是大港油田，有两个群众组织。“五一”派复员军人多，得到驻军支

持。而张承明支持的另一派“大联合”里老工人多。结果确定“五一”派参加工代会，引起分歧。

3月15日宣布五个代会的筹备小组成立，从15日到22日分别召开五个成立大会。3月18日大专红代会成立，没有天工“八·二五”，却包含很多“思想兵”。东风大学（天津师范学院）也只吸收了保守派组织。天大“八一三”为红代会“组长”，南开“卫东”为“第一副组长”。3月21日中学红代会成立。其中绝大多数是保守组织。王端阳他们后来组织了一次调查。“真使人气死，造反派被压了下去，保守势力掌了权。”（王端阳日记1967年4月13-14日）这也许是军训造成的。这样的组织完全是驻军的附庸。

22日工代会正式在民园体育场成立。李雪峰出席了大会。李雪峰虽在年初就到了天津，这是他第一次在公众面前露面。会议散了以后，人们走出会场，惊异地发现，会场外贴满了大字报，提出“打倒李雪峰”、“不承认我厂的保字代表”、“彻底打击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阴谋”等口号。也在这一天，反对“五代会”的组织“批刘邓、砸万张、反复辟联络站”（简称“反复辟”）成立，天津正式形成两大对立的群众组织。张承明没有参加这次工代会成立大会。他和其他造反派一起另立了山头。

反对派于3月14日在营口道开会决定了炮轰李雪峰的集体行动，有反修锦纶厂、机车车辆厂，以及北京高校许多造反组织参加。他们认为李雪峰是华北地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使者，曾派人到山西调查过李雪峰的材料。据说李雪峰到天津后，即与劳二半“八一八”接触。“八一八”坚决反对和河北大学“八一八”联合，没有谈拢。3月22日，劳二半“八一八”发表声明反对李雪峰。3月25日反对派在电车公司开“打倒李雪峰”串联会。按照后来天工“八二五”的说法，原则性的分歧是：“李雪峰的罪恶是树立了河老八为样板”。

五代会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大活动是在3月20日举行批判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会。大会口号之一是“一·二一政法公社夺权是反革命夺权”。参与这次夺权的天津大学学生当场涌上了主席台连喊带砸，把大会给搅了。

分裂是必然的。实际上这些官方按照血统论标准组织起来的五代会早已不是造反派组织了，而且完全由驻军说了算。王端阳 1967 年 8 月 14 日日记上说：“天津市主要问题就在天津驻军的支左问题上，很多问题红代会都已经做出决议，可解放军一不同意全部作废。实质上只有解放军说了算。” [7]

3 月 27 日，天津代表团赴北京向中央汇报成立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准备工作情况。成员有解学恭、肖思明、郑三生、胡昭衡、赵曙光和 49 名“五代会”代表及来自劳二半“八一八”、天工“八·二五”、河大“井冈山”等组织的特约代表。4 月 7 日、9 日和 10 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叶群等领导人，以及李雪峰、郑维山，三次接见天津代表团全体代表。

此时的局势，已从“二月镇反”发生了逆转。4 月 6 日，“军委十条”颁布。之前的 4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四川等地二月以来被逮捕入狱的造反派纷纷出狱。4 月 28 日，驻军再次来到汽车七场，宣布撤销 3 月 2 日的“七项规定”，被拘禁的造反派领袖被解脱。（9 月驻军又来场宣布平反决定）4 月，中学红代会中的造反派另立“中学红代会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再次批判血统论。5 月 13 日召开全市中学生批判“联动”大会。延安中学的经验经过毛的批示不能批判，他们就批判 109 中解散造反派的“三一 0 经验”。另外，“八·一三”、“卫东”开始为公安局夺权和“政法公社”翻案。

在这样的形势下，邀请了反对派的代表参加接见。在接见时，“工矿企业”的李勇、劳二半“八一八”王德明、反修锦纶厂的张承明、天工“八·二五”的帅关仁都发表了反对意见。他们当然不能过多指责驻军，就把矛头指向天津大学“八·一三”。当时“八·一三”在五代会和“反复辟”之间摇摆，被人说成“第三派势力”。

肖思明在会上做了检讨，主要有三点：一，成立的五代会仓促一些，“还有一些革命组织没吸收进来，由于调查研究不够，少量几个保守组织也进来了。”二，代表会议筹备期间负责人的选举问题，可能指张承明问题。三，“对张淮三一手泡制的七个野战兵团，

处理慢了一些”。

江青说：“抓人少，没开枪。天津由一个反革命大乱局面，到建立革命的新秩序，时间并不算太长，这和军队做工作分不开的。”周恩来插话说红代会“有一部分保守组织是必要的”。戚本禹说南开大学八一八“是有功勋的”，大概指“抓叛徒”问题。在这样的气氛下，不难想象接见定的调子是：天津市斗争大方向是万张反革命集团，天津的革命委员会暂缓成立，以五代会为基础，继续扩大大联合，把没有进来的造反组织都吸收进来。

“过去的造反派都下去了，而那些保守势力当了权，反过来对造反派施加压力。”[7]

“北京开会的调子一传下来，天津可就乱套了。最先开始乱的是和平路，两派的人都去宣传自己的观点，宣传车、辩论车都集中到了和平路，街头辩论，先是嘴斗，到处是辩论声，传单满天飞。和平路是一条商贸街，大联筹在财贸系统势力比较大，结果辩着辩着，大联筹就把和平路给控制了。”[9]不赞成打倒李雪峰的到了那儿就会挨打，成为著名的“和平路一言堂”。

双方矛盾不断升级。虽然造反派喊的是打倒李雪峰，但实质是与驻军的矛盾。后来“大联筹”方面直接喊出“刘政不支左，叫他靠边站”的口号。5月15日天津驻军发表最后通牒式的《支持革命左派联络站负责人对天工“八·二五”总部负责人的谈话》指责天工“八·二五”。从次日起连续几天，全市各系统造反派掀起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游行，表示支持“八·二五”，打倒李雪峰。5月19日，天工“八·二五”贴出海报，宣称全市设立十二个联络站征求意见。5月19-20日一些造反派围攻河大“八·一八”。5月24日天工“八·二五”贴出大字报，公布他们与解学恭、支左联络站负责人的谈判过程与结果。他们宣称天津市有一千二百个造反组织支持他们，并声称他们与支左联络站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支左联络站犯了路线错误，对待群众造反派上有路线性错误。

7月16日，反对派“天津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筹备委员会”，简称“大联筹”在海河广场正式成立，以天工“八·二五”为其总部。7月24日，大联筹查封了《天津日报》，迫使其停刊。

武斗

1967年7月，天津对立两大派开始武斗。为什么发展成武斗呢？“电车红旗”的高崇瑞说：“当时，造反组织替‘文革’初期受压的人说话，反‘资反’路线，得人心。保皇的不吃香。可谁都怕自己一派被压垮，就非把对立面压垮不可，这就愈打愈凶，全面干起来。一对着干起来，心也就不那么纯了。说实话，我这时心里也害怕，事情愈闹愈大，自己知道后期要算帐的；眼前又是一团乱，看不出头绪，总觉得有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吧自己往死道上推。我已是势如骑虎，退下来更没好，必须硬着头皮干，也就必须有实力，有实力就没人敢摸你。不单是我，社会上的造反组织都是这个心理，各拉各的势力，各树各的山头，很快地就不分行业系统，搞起横向联合的大组织。”[13]

在这之前，也发生过局部性的武斗。例如4月24日“大联筹”（当时还叫“反复辟”）20多单位三千余人冲击支左联络站，4月27日支持胡昭衡的体育学院人员到天津大学示威，与天大“八·一三”、南开“卫东”武斗，有万余人参加。5月5日，六四一厂“大联合”两千余人冲击支左联络站。5月12日晚上，铁路北站调度所被砸，导致津浦、京山线指挥中断23小时，这是工代会的内部摩擦。6月19日，市里在体育馆开会纪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发表10周年，胡昭衡出席，结果天大、南开等校反对胡的人和体育学院的保胡派打成一片。次日体育学院又派两宣传车到天津大学挑衅，引起冲突。五代会一派内部冲突不断，开大会时要将不同观点的单位分开就座。

6月30日上午天津拖拉机厂“铁牛”、“卫东彪”前后开着两部宣传车，中间还有汽车、拖拉机游行。走到河北大学门前，与河大“八·一八”武斗起来。

7月7日，发生大联筹围攻军工单位3527厂事件。事件源于该厂工代会人员支持隔壁的五十五中红代会。五十五中“红革会”请来“大联筹”的河北大学“井冈山”及“工矿企业”、“工农学革命造反野战兵团”等组织三千余人将该厂围住。在工代会策划下，工厂的人从后门撤走，未发生重大冲突，但成为两大派武斗的起点。

鉴于和平路被大联筹“一言堂”控制，工代会在7月26日组织了一次上万人的武装游行，都头戴柳条帽，手持白蜡杆。这次挑衅性的游行未发生大冲突，但此后双方都开始武装自己。7月27日，“红革会”围攻市委“联委”，河北大学“八一八”参加解围。

8月9日，河北区的天津政治师范学校又发生类似冲突。该校“红革会”向“大联筹”求援。“大联筹”派队伍攻下该校主楼，红代会撤退。有谣言传说，在武斗中发生强奸事件。此时，五代会方面调兵遣将，派队伍进驻河北区的609厂作为据点。

在政治师范学校武斗时期，河北区的609厂属于五代会的“春雷兵团”封锁了京津公路，扣留了天津大学给本校参与围攻人员送饭的一些人，还扣留了天工“八二五”的一辆大轿车连同宣传队。为此，66军政委杨银生和江枫、胡昭衡等领导都出面调停。[7]

“大联筹”方面开始围攻609厂救人。此时双方有万人参加。“大联筹”设立了临时作战指挥部，武斗人员脸上贴橡皮膏用于识别，还开去一辆宣传车指挥。609厂工代会的“春雷兵团”早有准备，在厂内安装了土炮，原理和明朝末年使用的大炮一样。这种炮听起来很吓人，但实际杀伤力不大。还使用了一辆推土机当坦克用，车上有人喷硫酸，冲击对方。这个阵势吓住了“大联筹”的进攻人员，纷纷败退下来，宣传车也被砸毁。战斗暂时停止。但是晚上，“大联筹”方面占领了609厂隔壁的制铄厂，五代会人员撤退，没有发生战斗。

10日晨，曾有712厂五代会人员乘数辆卡车支援609厂。该厂处于新开河南，距离609厂十余里。乘有武斗人员的卡车经过新开河上的新开桥时，发现有“大联筹”人员布置的钉板。他们排除钉板后继续前进，走到南口路的铁路桥，又发现桥上早已准备了几十块大滚石，于是只好向“大联筹”投降。[59]

这一天“大联筹”汲取昨日教训改变战术，先派小股部队分拨分批逐步前进，向守方投掷砖头和螺母。守楼的609厂人员仍像昨日一样，打开大门，推土机首先开出，大批人员随后跟进。进攻方小股部队见势退后，609厂人员乘胜追击，却不料预先埋伏在居民区的“大联筹”精锐部队“尖刀突击队”突然冲出，609厂五代会人员一看不好，纷纷撤退，

结果推土机撤退不及，被“大联筹”俘获。推土机上一名向对方喷硫酸的人员当场被打死，司机获救。“大联筹”方面开着这辆推土机闯开了609厂的大门，反败为胜。

眼看609厂方面要败北，救星来到。这天下午，从支左联络站传来陈伯达和郑维山的指示：“攻打609厂是错误的，动员天津的工人阶级保卫609厂！”根据这一指示，五代会组织了20辆卡车，近千人员增援609厂，并广播首长指示。见有援兵来到，“大联筹”就没敢贸然继续进攻，609厂的围遂解。

11日，在中央干涉下，双方脱离接触。此役在交战中死亡四人。除去推土机上那个五代会609厂的人死亡外，还有一名纺织厂的人去支援609厂时被小口径步枪打死，“大联筹”六四一厂一个人被自己人误会打死。厂里“春雷”一个人打土炮被后坐力撞死。但是武斗结束后五代会打死了他们抓到厂内的两个人，一个是“大联筹”“工矿造总”的张鸿俭，另一是五代会的人，也被误会抓住并且给打死了。第二天，“大联筹”把这两具尸体抬到公安局门前示威，并把这件事当作以后谈判的重要筹码。所以这次武斗虽是“大联筹”方面为进攻方，但五代会方面也没有占理。这次武斗双方共死亡六人，据说天津全市性武斗也就死这六人，算上单位内部的武斗，总共死亡11人。[3]这个数据可能不准，但总数估计也不算多，而且609场战斗中，死亡的六个人中，有三个不是被对方打死的。这与双方，包括驻军，都比较克制有关。

7月28日天津钢厂发生武斗。该厂造反派的最大组织是“红色造反大队”；保守派的最大组织是“新冶金战斗兵团”。[60]8月，天津新港又发生武斗。

中央领导接见与革委会成立

鉴于天津的局势，中央加紧予以处理，从1967年8月15日起，连续11次接见天津市代表，就制止武斗、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等问题进行谈判。由于中央领导事务繁忙，这些接见多在晚间开始，延长到次日凌晨，或者就在半夜两三点开始。参与接见的首长主要是陈伯达、谢富治和郑维山。

609厂武斗以后，从8月15日到19日，连续四次接见，主要讨论制止武斗问题。18日签订了《关于立即坚决、彻底制止武斗的协议》。8月19日接见讨论“大联筹”冲“五代会”游行队伍问题。24日第五次接见，签订《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协议》，还讨论了六四一厂协议、塘沽问题协议。

9月8日第六次接见，江青、戚本禹也参加了。江青态度激昂，指责“大联筹”领袖林造反奸淫妇女，要把他枪毙。陈伯达和戚本禹说天津流氓的奸淫烧杀的暴行，忍无可忍了。这样的指责，实际上在第五次接见时就提出了。诬陷造反派奸淫妇女是文革中惯用伎俩。609厂武斗后，他们厂的人把抓住的“大联筹”的张鸿俭活活打死，就是有人说他在政治师范学校武斗时强奸妇女。

实际上，开始讨论大联合的时候，中央的方针已定，就是支持五代会。解学恭、江枫和驻军首长曾先后找林启予谈话，征求对大联合的意见。林启予提出的方针是，对于群众组织，要以天大“八·一三”、南开“卫东”为骨干，团结河北大学“八·一八”，分化瓦解天工“八·二五”。这个意见被领导者接受，即“大联筹”应该解散。[9]

第六次接见后，按照中央首长指示，双方群众组织，主要是“大联筹”，各自清理内部。“‘大联筹’自己也出通知，不准再开车吹哨，带武器，破坏交通规定，违者严办。同时通缉林造反几个。这样坏人更孤立，教育群众。‘大联筹’坏就坏在有这么一批坏蛋给捣乱，广大群众是好的，也不允许敌人破坏。解放军贴出大标语：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土匪、流氓。署名：天津驻军。”[7]

“大联筹”可能确实有些下属组织不干好事，但也可能有些是冤枉的。9月16日公安局军管会提出林造反等五名“坏人”要求群众讨论。9月19日全市群众大会公审16名“坏人”，其中两名当场拉去枪毙，其余判处死缓和其他徒刑。这16名“罪犯”都是青少年。其中16-17岁9人，18-20岁4人，21-30岁3人。

9月14日第七次接见，同时接见的还有石家庄、唐山、张家口的群众组织代表。陈伯达给“大联筹”鼓了掌，因为上次接见以后，“大联筹”在自己队伍里抓了28个“坏头头”，

军管会按政策只收了11个。五代会只是进行了“内部整风”。

9月26日第八次接见，周恩来、陈伯达、谢富治讲了一些鼓励大联合的话。此时大势所趋，一些单位的对立组织在形式上实行了联合，

10月10日第九次接见，主要接见“大联筹”。陈伯达说“大联筹”背后有野心家，明显给“大联筹”施压。此时中央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以五代会为基础，将“大联筹”吸收进来，促成大联合。

11月22日第十次接见，陈伯达再次攻击“大联筹”，明确显示企图将“大联筹”分化、瓦解。他公开表示反对“大联筹”的赵健敏和白金生，引导张承明说“大联筹”的坏话，还指责“大联筹”的小站代表、小学教师刘秀荣“复辟”。“大联筹”在小站是反对四清上台的那些干部的，自然也是陈伯达坚决与“大联筹”为敌的原因之一。6月30日，陈伯达还发布一个关于小站四清的“指示”：“小站‘四清’不能翻案，刘晋峰不能复辟。”刘晋峰是在小站“四清”时被解职的天津市南郊区区委书记。[61]

“大联筹”基本上是个工人组织，得到广大市民阶层的拥护。他们在市内游行时，简直是万人空巷，到处受到热烈欢迎。正因为他们人多势众，得到群众拥护和支持，在武斗中往往取攻势。这使得他们在首长接见和谈判中容易失分。

“大联筹”本身也有一些致命弱点。成员包括领导的文化素质低，缺乏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也无高人指点。没有能和中央说得上话的领袖人物。像“工农学革命造反野战兵团”这种组织，一听名字就感觉像个大杂烩，事实上也可能成分复杂。其领导人白金生是个三轮车工人，属于集体单位，被谢富治抓住把柄，说到集体单位就是倒退。609厂武斗后，中央叫天津两派各派25人到北京谈判。大联筹原定去23人，结果只去了5个。为什么不敢去？害怕，“不知上边嘛主意，吉凶莫测。”等到知道没危险了，又争着要去。[13]去了以后，说话也不知深浅。5月20日，“大联筹”所属三轮社100多辆机动运输车到河北大学打砸抢，非常失去人心。

12月2日第十一次接见，有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姚文元、吴法宪、

郑瑞山参加，主要宣布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委会的报告。筹备小组核心组拿出革委会成员名单，大家鼓掌通过。

天津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副主任肖思明（河北省军区原政委）、郑三生（66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区司令员）、江枫（市公安局局长）。常委28人。其中军队干部有杜文达（66军原军长）、杨银声（66军政委）、刘政（66军副军长）、王一（天津警备区第一副司令员），行政领导有王占瀛（原天津市副市长）、王亢之（原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范永中（原天津市人委副秘书长）。其余为群众代表和一般干部。群众代表中有一半是工人。高校代表出自南开、天大、河北大学、体育学院。

12月6日，天津市革委会成立，解学恭为主任，肖思明、郑三生、江枫为副主任。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海河两岸尽朝晖——热烈欢呼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案件

1967年11月，天津市公安局收到公安部转来一件“反革命传单”案，因为信封和信纸都是天津产品，指定由天津破案。案情是北京市很多单位在10月接到一封“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给全体党员的一封公开信”，“妄图诬陷中央领导同志”，其投递时间是10月8日，故又称为“108大案”。

传单说，当前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与其所宣传的革命词藻完全相反，实际上是在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文化上、思想上对党和国家的全面破坏，时间越长所造成的恶果就越加严重。传单还批判了中央文革主要领导人陈伯达、康生和江青，认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传单还指责了林彪：“为什么这伙人如此猖狂？主要是因为党内身居高位的人为他们撑腰打气。林彪过去在战争中立有卓越的功勋，但是如今却充当了这伙人的主持者。由于林彪是掌握枪杆子的，不是他助纣为虐，事情就不会憎到如此可悲的地步。”传单还指出：“作为党的领袖，毛主席也不能辞其咎。毛主席以他

的伟大的革命实践，在党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但是他反复无常，遇事多疑，往往从一个极端中到另一个极端。一位领袖如果有了这些弱点而不能自拔，不可能不给他所领导的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传单唯一赞扬的人是周恩来，认为正是由于有了周恩来的日夜操劳，苦撑大局，局势才有一线可能挽救的希望。

接下来，传单提出了一些建党建国的纲领性主张，要求全党予以支持，并建议成立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来代替旧的中央委员会。传单最后还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他们不乏自己的真正领袖，不过这位能够收拾目前混乱局面的领袖人物，必须是与这场浩劫没有牵连的人，是大多数人民所真正信赖的人。”

传单列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成员名单。朱德为委员会总书记，陈毅为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为总理，政治局常委们有董必武、李先念、徐向前、刘伯承、叶剑英、贺龙、聂荣臻、谭震林、王震等人，其它有中央委员有100多人，都是从中央到地方被冲击打倒的领导干部。文字的口气很大，用的旧词汇、旧术语较多，署名是“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战马悲鸣战斗队”。[62]

这份纲领性的政治文件，实际上大部分未投寄到各接收单位，而是被邮局于10月9日发现后截获立即上交，上午10时到了周恩来手里。周对此极端重视，鉴于涉及许多领导人，立即送了一份给毛泽东。当晚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周拿出此传单叫大家讨论。因为事关重大，会议未作任何结论。次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亲自召集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传单问题。除了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议的人以外，林彪也来了。毛详细地询问了传单的情况后，让大家发表意见，最后对周恩来说：“恩来，你负责组织项目组去破这个案，一定要破案。”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具体落实毛泽东的指示。他当场指定陈伯达和谢富治、于桑组成专案的项目组负责此事，迅速展开侦破工作。

到了11月，天津市公安局根据传单笔迹侦破了此案，是一名叫沈剑云的煤球厂工人干的。他和沈靖环、李素等七人于1967年7月间写成传单，油印80余份，于10月8日投入北京九个信箱，分别寄给20多个省市的新闻单位。

首犯沈剑云虽是个煤球厂工人，但有些来历，说明天津确实是个藏龙卧虎之地。他出身地主家庭，大学文化程度，曾当过国民党宪兵，1949年后曾任天津市法院书记员，于1957年查出后被管制，到煤球厂当了工人。

虽然审讯时沈供认主要是对当前混乱局面不满，盼望国民党回来。但是据说涉此案的共15人，包括沈的老婆孩子在内。他们不可能都有国民党情结，从这封信的内容看来也不像，所以这些人的作案动机主要是对现实不满。

天津市公安局侦破此案后，认为可以结案了。但是汇报上去，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等领导人认为一个煤球厂工人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传单，要求继续追后台，并且指示成立有军代表参加的新专案组。他们后来制造出与此案实际无关的一些冤案。这项专案工作直到1969年还在进行。

此案直到文革结束后才结案。1979年12月30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按反革命煽动罪判处沈剑云无期徒刑，对沈靖环、李素等五名罪犯分别判处3至5年有期徒刑。1984年1月16日，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沈剑云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改判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5年，沈靖环、李素等人虽参预了一些活动，但情节轻微，不构成共同犯罪，予以释放。[34]此时沈剑云的羁绊时间已超出刑期。

在此案中上级要求“追后台”而迟迟不判决实际上救了沈剑云的命。如果在文革中判刑，他必死无疑。

三、革委会成立以后

“二·二一事件”

天津市革委会于1967年12月6日成立后不到3个月，就发生“二·二一事件”。

这一事件早就有些苗头，绝非江青临时起意。1967年12月2日，在第11次接见天津市代表时，周恩来就提到天津的文艺界和公检法问题。他说，对于江青在11月9号、12

号的两次讲话，天津没有反应。“文艺界黑帮在北京活动，在天津也有，应该注意。”他还说：“天津公检法是万张集团产生的重要基地，现在挖得还不深，以前天津在旧社会是个国内外反革命分子窝藏的地方，有很多租界，地富反坏右在那里活动，到现在还有他们的房产，剥削阶级在天津很多，叛徒天津也有人嘛！”他当时还说过一句话，对万晓塘自杀定性表示怀疑，但传达时没人提这句话。

11月9日和12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先后两次接见中央直属文艺团体，江青着重谈文艺界问题。她在12日说：“文艺界比较复杂，从你们发言里头，送给我们的材料看，但是搞深搞透没有？我看没有！因为敌人是很狡猾的，一套一套班子，你搞掉一套，他又来一套了，所以我觉得应该作深入的调查研究，要稳、准、狠对敌人。”

1968年2月21日晚，中央首长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等人在北京接见天津市革委会及群众代表千余人，并发表重要讲话，史称“二·二一事件”。

这次会见对于天津市革委会很多负责干部来说都很突然。革委会办公室秘书组组长王辉上班后才知道昨天革委会领导带人上北京开会了，因为是支左办公室派人一个一个通知的，所以连秘书都不知道。这天上午又通知更多的人集合，有革委会干部、部队代表和群众组织负责人，总共一千余人。下午乘汽车去北京，先安排在二炮司令部休息，晚上到京西宾馆开会。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汪东兴、叶群，以及一些部队负责人接见了代表。

会议由江青主持。她一上来就提出“二黑”问题，为会议定调。她说：“在你们天津，去年‘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代表座谈会’，有这么一个黑会，知道吗？黑的！还有一个黑的戏，叫做什么《新时代的‘狂人’》，有没有？黑的！”这“二黑”后来又称“一个黑会、一个黑戏”。

这个“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代表座谈会”原定于1967年11月10日在天津召开，已有北京、湖南、河南、安徽、广西、陕西、山东、四川等省市代表报名参加，但遭到天津军管会制止[2]。13日天津革筹小组和支左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未经中央批准的任何全国

性会议都是非法的，要求这一会议立即停开。1967年12月2日周恩来在讲话时，江青就插了一句话：“天津搞了个防空洞，什么全国业余作者代表大会。”

《新时代的“狂人”》是天津市话剧院113革命造反队在1967年5月排演的反映陈里宁事迹的话剧。陈里宁是造反派在北京精神病院发掘出来的一位湖南干部，据说有反对刘少奇的言论而被尊为先知先觉的英雄人物，后来在1967年8月以后又被否定。

江青在她的讲话中横扫了天津的一大片。除去“二黑”以外，她还点了天津文艺界一大批人名。她还说河北省献县、深泽县有大叛徒集团。这就涉及了原市委书记处书记、现革委会常委王亢之。在点作家方纪时，又点到公安局，说“上次我和总理就点过你们天津文化界、公检法，现在我着重地建议，公检法的问题，应该彻底揭开。”在姚文元、康生的讲话中，也分别批判了方纪等人的作品和“二黑”。在周恩来最后的讲话中，也肯定了江青的讲话，要求批判“二黑”，“改造公检法”。

陈伯达在江青开场白后第一个讲话。除去点了天津文艺界方纪、孙振、白桦等一大批人名以外，他把黑戏、黑会联系的是“社会上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潮，而且反映了这个思潮形成的组织，比如在天津有‘大联筹’、‘政法公社’，在河北，在保定有‘省委兵团’、‘八五风暴’、‘农大红色造反团’。石家庄，比如‘狂派’，……”点了几乎所有天津、河北造反派的名。

关于这次会见的细节，谢燕的说法是：“1968年2月20日，中央文革小组通知天津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要他带领江枫、王亢之、胡昭衡等六名干部去北京。第二天，中央文革小组又通知天津，由各群众组织选派一千多人去北京。就在这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京西宾馆大礼堂，召集他们开会，听江青讲话。”这次会后“接着中央文革小组又召集少数干部开会，江青讲话时点了王亢之的名，说他是‘深泽叛徒集团’的头子，‘日本特务’，‘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骨干。又点了江枫的名，质问他跟‘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什么关系，骂他是小爬虫、变色龙。也点了胡昭衡的名，说他是坏人（胡被叫到北京，大概因为他不是革委会成员而没有让到会）。”[49]

2月20日小型会议的具体内容未见报道。21日大会后，天津市领导并未马上回津，而于22日下午在北京二炮驻地召开天津革委会全体会议。而周恩来年谱记载：“2月29日听取天津市负责人的汇报。日前曾提请江青考虑：该汇报会是在开大会和核心小组会之后，不要解学恭出席是否适当，是否有不利后果。”[57]这次听取汇报可能就是谢燕所说的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少数干部开会，也就是王端阳日记所说的“经过揭发、学习几天后，中央又接见肖思明”[7]。肖思明是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原河北省军区政委。

林启予记载：“到天津后，24日向全市传达中央会议精神，由肖思明传达，解学恭主持。宣布对江枫隔离审查，其他人有的被停职，有的被逮捕。”[9]可见，肖思明曾于22日会后回津，29日又到京开会。解学恭可能根本没再去。

“二·二一事件”解读

我们仔细描述“二·二一事件”的过程，是因为其中确有若干诡异之处。这一事件的起因至今不明，王辉认为是王曼恬就“二黑”问题向江青告密所导致。[4]王曼恬原是天津市文化局干部，文革初期也曾被批斗，曾自杀未遂，后来因是毛泽东的表侄女，被委任为管文教的市委书记。

王辉的书上说：“当年我们查出，王曼恬自1968年3月到1976年10月给江青等人的信件33封、电话记录23份。她的主要问题，就是向江青写密信制造了所谓1968年‘二·二一’事件，后果严重。”这批清查出来的“密信”是从1968年3月开始的，而“二·二一”事件发生在2月。所以，这可能还是个疑案。因为周恩来在1967年12月2日就提出过天津的文艺界和公检法问题，所以可能不止江青这条线。

江青是文艺界太上皇。凡未经她批准的一切文艺界举措都被认作忤逆。她还在11月9日和12日讲了文艺界要清理队伍，要阵线分明，要阶级斗争阵线分明，树立队伍，抓坏人。所以天津的黑会和黑戏撞到她的枪口上了。她还说过一句话，后来正式文本删除的：“天津真复杂，阶级敌人有很多套班子，一套完了又换上一套，而且现在还有他们的人。”[7]

但是王辉也说，这一事件可能还有深层原因。事情要看谁从这一事件得利。

北京开大会后，“第二天下午，召开天津市革委会委员全体会议，在主席台就坐的是：解学恭坐在正中间，他的一侧坐的是肖思明、郑三生、杨银生，全是66军的代表；他的另一侧坐的是王一、许诚、王元和，全是警备区的代表，地方干部的代表一个都没了。江枫坐在会议室门口，始终低着头。这阵势一看就明白了。”[9]三结合完全变成军人专政。

小站四清建立起和陈伯达联系的王亢之、江枫、范永中这些地方干部被一扫而光。所以“二·二一事件”是江青对陈伯达的重大打击。陈伯达说当时“我要阻止已来不及，还被迫也参加。”[64]因为这个接见上被点名的方纪去年还和王亢之一起乘天津市公安局的车到北京找他汇报小站“复辟”问题，所以他在会上颇为尴尬，但是他又将大棒挥向更加弱势的群体天津大联筹和河北的其他群众组织，也许是怕他们乘此翻案。陈伯达后来投靠林彪集团，此时已见端倪。

1970年“批陈整风”和华北会议期间，又把此事和北京军区的郑维山联系起来：“1967年6月，郑维山把陈伯达包庇的反革命分子王亢之、方纪、李树夫接到军区招待所窝藏起来。6月24日，陈伯达在他办公室与郑维山、王亢之、方纪、李树夫密谈四个多小时。”[65]

这次二·二一讲话影响极其恶劣。它破坏了天津市成立革委会后稍微稳定一些的局面，大批干部、群众遭受新一轮迫害。

公安局长江枫在散会后立即被隔离审查。3月1日，王亢之于从北京返回的当天服安眠药自杀。范永中是原市外贸局局长，革委会成立时担任办事组组长，不久就因所谓政治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革委会中的地方干部只剩了一个解学恭。

3月2日，支左联络站召开了天津文艺系统、公检法系统8千余人参加的大会，传达了二·二一讲话内容，动员彻底揭开公检法系统阶级斗争盖子。

3月9日，在民园体育场批斗著名作家方纪，使用刚刚有的电视直播。林希描述当时从电视看到的火爆场面，和运动初期造反派批斗当权派时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那

才是一股火药味呢，全副武装的军人们持枪站满了运动场的四周，明明是如临大敌，就是当年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也没见过这样的场面，看着真让人毛骨悚然。”然后看到八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拉着戴着手铐脚镣的方纪，走上台来。在三个小时的批斗中，他还不断遭到殴打。[66]这样的电视直播批斗大会又继续召开多次。4月25日电视批斗张淮三等原来的领导干部。

“二·二一事件”后，江青批评天津市军管会，说：“你们的阶级斗争搞得不好。上海、北京的资本家子女都有组织反革命集团的，都及时抓了。你们城市里有那么多资本家子女，怎么会一个反革命集团没有？”于是天津军管会赶紧罗织罪名抓了一批资本家子女。其中一个的罪名是“企图组织反革命集团。”判了20年徒刑。[13]

中央接见肖思明等，说不要叫“大联筹”翻案。所以在“二·二一”后，尽管一些领导干部受到冲击，挨整的还是“大联筹”。“中央文革一翻脸，大联筹完了，大小组织树倒猢猻散”。[13]

实际上，“大联筹”早已溃不成军。“两黑”涉案的都是五代会群众组织。“这次搞两黑一砸的都是当时铁杆‘河老八’派，也怪了，只有艺师‘八一八’是‘反复辟’的。”

“下午吕英传达了昨晚顾师长讲话，主要是搞臭‘大联筹’、‘红革会’，贯彻中央‘2·21’指示精神，在学校震动很大。”“中央‘2·21’讲话是叫从文艺界、公检法打开缺口，彻底揭开万张盖子。这方面天津动静不大，而揪坏头头甚凶。”[7]

当时流行口号批的是“二黑一砸”。除去“二黑”以外，还有“一砸”是指砸文联“红旗”这个群众组织事件。（王辉说“一砸”是“砸烂公检法”，疑有误。）天津文联在文革中分两大派。“业总”依附河北大学“八一八”一派，支持王亢之、方纪、孙振等干部。与其对立的“红旗”则支持作曲家王莘。这个“黑会”就是“业总”组织的，方纪参与其中。1968年1月17日，“业总”方面由河北大学“八一八”的“燎原兵团”出面砸了“红旗”。[8]但是这个“红旗”是受到王曼恬支持的，所以据说王曼恬告状时，也把这件事包括其中。此外话剧《新时代的“狂人”》公演前，夺权筹备小组和支左联络站也参加了审

查。正因为如此，王端阳对这局势很不理解，就是为什么挨整的还是“大联筹”。

深泽县“揪叛徒”

江青在二·二一讲话中点名说河北省深泽、献县有叛徒集团。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宋景毅都是深泽县的，自然成了“叛徒”。于是，天津市和河北省大批人员涌进这两个县去“抓叛徒”。天津市几名中学生到了深泽县，找到宋景毅家原来住房，这里现在由一名叫做王怀丹的村民居住。当时王怀丹不在，他们说王是宋景毅的走狗，把他的女人打了一顿，捆了起来，然后“砸锅、摔碗、翻箱倒柜，把被子、褥子、破衣烂衫统统扔到屋外。”“在粮囤里撒灰土，在面缸里倒脏水，镐起锹飞，挖地拆炕”。等王怀丹回来后，不分青红皂白就打，将其夫妇从上午八点打到下午两点，最后将他们赶出家门。到晚上，王的妻子已不能走动，只能往娘家爬。王本人则自杀身亡。他们的罪状只是住了宋永毅的房子。另一个小组则闯到天津市委监委书记李守真的妹妹李素端家，对其严刑拷打并抄了她的家，封了门，送去劳改。

他们在一个当地的集日还被通知到集上参观“亮货”。到了那里一看，“只见临街靠巷的屋顶上有一排排弯腰曲背的人，街上也有排成队的，他们是县直单位和部分社队揪出来的‘黑货’。这些人有的戴着白袖章，有的背着草人像，有的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木牌子。” [67]

1970年以后，运动进入专案审理和落实政策阶段，全县列入专案的有60余人，其中16名算叛徒集团主要成员，但都没有叛变自首的确实证据，案件就这样拖了下来。

在这场“揪叛徒”运动中，深泽县被揪2900多人，1500多人在集市上亮过“货”，受株连3万多人，占全县人口五分之一，不少人被打致死致残，很多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军管下的公安局

公安局军管会于3月初召开了“誓师大会”，进行动员，要在公安系统内部开展“一批三查”运动，即是开展革命大批判，一查万、张反党集团和走资派的幕后活动。二查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分子。三查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并宣布从三月底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此后对全市公检法各级干部进行全面审查，共审查干警4700多人。1969年5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基本结束，认定公检法队伍中有各种政治历史或现行问题者1094人，经定案落实，定为敌我矛盾性质者177人，其中逮捕判刑者12名，戴帽监管者23名，“帽子拿在群众手中未戴”者28名，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者114名。

[34]

接着人员大换班。到今年6月，由公安机关调到其他单位工作者4940人，与此同时有军队干部1936人，退伍战士2476人，分配到天津市公安机关工作。

在公安局内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声势不减地方，造成的后果或许更恶劣。其中最大的案子是治安二处的“里凡案件”。里凡是治安二处技术科长，被人检举是三青团员、潜伏特务。在连续三天的突击审讯中，将里凡屈打成招，被迫承认是中统局天津情报站第三小组组长，曾窃取重要情报，并交待了潜伏全国11省的83名特务名单，造成全国性连环大案。由于涉及新疆公安系统，导致该系统4人被迫自杀身亡、9人被刑讯致残。他还交待国民党给他的电台埋在驻广州办事处的院子里。于是军管会主任刘政向北京军区申请了一架飞机，亲自率员去当地挖掘，自然空手而归。

天津市公安局内另一重要案件为“李良案件”。李良，原名林曾同，据说是林则徐后代，多年从事情报工作，后有人反映他在香港期间曾暴露过身份，于1966年调回审查。由于他只与江枫联系，1968年2月江枫出事后，李良绝食抗议。因为李良被拘禁时不断骂中央首长，军管组申请并经市“核心小组”批准，于1968年4月21日在市体育馆召开大会，对其进行批斗，并宣布为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送监狱关押。此后李良仍坚持绝食，于1969年2月17日庾死狱中。他死后，军管会于10月31日将其定为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后来时局变化，对其评价不断升格，军管会和公安局先后三次在大会上为他平反昭雪，

两次为他举行“追悼仪式”，四次作出“关于李良问题”的决定，最后完全恢复名誉，定为烈士。“它是引起的公安干警气愤最大，张贴大字报最多、上纲上线最高，引起国务院和中央最关注的案件之一。”但对此事件的性质，仍存在不同意见。[34]

在公检法内部尚且如此，军管会办案更是无法无天。典型案件为“林造反案”。当时搞臭大联筹这样的群众组织，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的坏头头枪毙。而枪毙的理由最好是很丢人现眼的罪名，例如强奸妇女。这样的抹黑手段在文革中屡试不爽，现成的材料也不难找。在1967年7月武斗期间，大联筹的“工矿企业”领袖林造反等对其对立面地毯五厂的“铁梭战斗队”进行“封门查抄”时，曾将这个战斗队的女负责人王凤池关押一夜。事后，王在同伙唆使下，诬告被林等轮奸，称“七二六反革命轮奸案”。1967年9月，公安局军管会接手此案，将王讲话录音送到北京。江青得知后，指示要把林抓起来枪毙。当时公安局办公室法制课副科长刘乃强认为轮奸不成立。军管会于1968年12月以“包庇反革命的顽固分子”罪名将刘逮捕，判处8年徒刑。后来王凤池翻供，承认是假造，生理检验结果也是处女。但军管会以江青仍在督促为借口，于1970年5月21日将林造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另一个从犯程国富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林造反原名林树芬，本是劳二半的一名木工。这是天津文革期间一件著名的冤案，该对此负责的，显然不是江青而是天津公安局军管会。在二·二一事件以后，江青再一次被利用。[34]

公检法在军管会统治下，冤假错案层出不穷。如1969年12月军管会审批小组认定由个体医护人员为主组成的“天津市联合门诊部”为地下黑医院、反革命组织，将其主要负责人鲁玉甫定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经复查，认为是“个体劳动者组织”认定无罪宣布释放。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江青等人“二·二一”讲话产生的波澜还未停息，又接上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革委会成立之后两派对立的格局转变了，大型武斗基本上不再发生。但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

革委会‘一言堂’的局面正逐步形成，以革委会名义开展的运动接踵而来。枪毙林造反之后，‘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整个社会上，从单位到街道，都是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执掌大权。有些单位的政策水平极低，批斗、抄家、打人、‘坐飞机’、关‘牛棚’、整黑材料，动不动就开除党籍、遣送的人太多了……比1966年扫四旧动静要大得多。”[9]

首先拿“大联筹”开刀。“电车红旗”领袖高崇瑞，因指挥过609厂武斗，被逮捕后严刑逼供，捏造了一个打死人的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工矿企业”的领导人李勇和董广发被“群众扭送”公安局。“工农学野战兵团”的白金生被定为“坏分子”。天工“八·二五”的赵健敏在学校长期劳动改造。汽车七场的陈风雨于1968年3月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关进监狱，却不算坐牢，只算审查，直到9月才释放回场。所有“大联筹”领导无一幸免。

出身不好的人、知识分子再次遭难，而且是更大的灾难。例如铁三院一位被打成右派的工程师，侥幸躲过1966年“红八月”这一劫，却在1968年9月被批斗、拘禁，还被抄家，连累老父吓得上吊自杀。然后全家7口，连同5个孩子全部遣送湖南老家农村落户，直到文革后的1980年才落实政策回到天津。[13]

1968年清华大学“七二八”事件后，工宣队开进个大学。此时，解学恭、刘政召开了一个革委会中群众代表的座谈会。刘政点了张承明等几个人的名当面斥责。南开大学的于泽光质问刘政：“刘军长，你也是革委会委员，我们也是革委会成员，你有什么资格点人家？”于当时毕业已分配至天津手表厂下放劳动。会后，刘政马上命令将其分至河北省最落后的衡水专区。后来，衡水方面又根据天津转来的材料将其打为“五一六”分子。[9]

1968年8月，工宣队进驻南开大学等学校，立即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1968年8月20日上午，工宣队2400人进入南开，21日上午11时后又进入1200人，共3600人。进驻历史系的工宣队是天津火车站东站铁路工人和三配件厂工人，是8月24日进入的，为总团的三团四连。他们把教师分为5个组，即忠字组、立新功组、斗私批修组、坦白从

宽组、抗拒从严组。” [10]

其中“抗拒从严学习班”就是牛棚。在历史系有近20人住在里面。“一旦哪位被工宣队宣布进入‘抗拒从严学习班’，就如晴天霹雳，吓得魂飞魄散。”“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初期解散的劳改队于此时又恢复了。（按刘泽华老师的回忆录[68]说他在1967年2月进“牛棚”，后文又说他在其中“泡病号”，请假到医院看病，开了腰椎骨质增生的病假条，要求休息，从此不去劳动了。似乎不是“住宿”的劳改队。）

“工宣队进驻南开大学后，采取高压政策，除红卫兵外，教师们总是提心吊胆，那些老教授差不多都有历史问题，更是度日如年。个别人实在熬不住了，在绝望中自杀。中文系、外文系、化学系等陆续出现自杀身亡事件。” [69]

“1968年12月下旬，校军工宣传队清理阶级队伍第一阶段结束，在大操场举行大会，工宣队主持，宣传部干部，原为历史系教师郭××在大会上发言，点名批判何锡麟、姜平、滕维藻和我，并称‘南开大学叛徒成堆，特务成团，反革命分子成串’。当场揪出历史反革命杨翼骧和蒋哲时。杨抗战初逃出北平赴西南联大继续就读，行至武汉，路费花光了，就报考国民党游击训练班，约半年，就是这经历，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帽子，文革中被专政。蒋年轻，未发现什么问题。这次大会，全校人心惶惶。”

同时期工宣队开进天津大学。“1968年8月20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天津大学，先后达5000多人。工、军宣队按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和政策，直接操纵了破坏天津大学教育事业的‘斗、批、改’。1968年11月，在工宣队、军宣队领导下，天津大学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 [70]

一位被关进：“牛棚”的天津大学教师回忆：“大概是1969年秋天，军、工宣队已经进校掌权半年多，有一天通知住在牛棚的我和系主任买好明天午餐，准备明天下乡劳动。我虽多次挨打，牙齿也被打掉几个，年已44岁，身体尚可。给我的任务是用大筐抬土，折磨的方法是年轻的大学生换着个和我抬。他们一个人抬几次累了，换另一个，我总是不断地抬。虽然摔倒过，但我一直坚持到中午。没想到我勉强吃了午饭后竟遭到几个青年教师

的审讯和殴打，动手的包括干部出身的助教。但一些正直的教师对这种折磨和殴打深感不平。工宣队中坏人不少，大搞逼供信制造冤假错案。他们审讯落难者通常是由一个工宣队员主持，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参加。给落难者强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不承认时工宣队员躲出去，学生或教师对落难者进行殴打或动刑。这样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71]

河北大学情况类似。外文系教师蓝英年回忆：“那时把我们教职员编入三种学习班，一类属于有严重问题的，集中住在学校交代问题，不许回家。第二类属于有问题或思想反动的，一面学习，一面交代问题，但可以回家。第三类是普通教职员，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觉悟，争取思想尽快革命化。”[72]

据河北大学一位校革委会委员回忆，在革委会成立后，中文系一位老教师跳楼自杀，被送至医院。医院询问要不要抢救，抢救就得输血。革委会开会提出不给他输血，致使此人身亡。相应材料未说明此事件发生时间，估计是“清理阶级队伍”时期。[73]

在一些工厂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场面更为凄惨。位于塘沽的天津碱厂，原名永利碱厂，是著名民族资本家范旭东创建的化工企业。为发展事业，他广泛招揽人才，据说各著名大学有关专业历年毕业生的前几名都被他招揽旗下。他给了他们比较优厚的待遇，舒适的居住环境，让他们发挥作用。这些专家经常在一位刘工程师家中聚会，就是我们现在叫 party 的那种活动。文革一来，就被称作“裴多菲俱乐部”，全都被游街批斗。刘工程师被一连抄家五次，从原住的“新村”赶到号称“垃圾大楼”里十来平米的房间里居住。

1968年春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后，这个厂的革委会利用原废弃车间建了一个关押这个“裴多菲俱乐部”和其他被审查人员共百余人的牛棚，后来成为令人胆寒的真正魔窟，时人称“63号”。刘工程师和其他数名专家被打死于斯。

“在此案件中，有107名干部、工人、技术人员和家属被关押，3人被打死，15人被逼致死，30多人自杀未遂或受伤致残，受牵连人数达450人之多。”[74]

这个魔窟维持了两年多。消息渐渐传到北京。1970年6月24日，陈伯达在解学恭陪同下到该厂视察。事后他们才开始悄悄放人，并销毁一切罪迹。

“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

在学校里，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刚结束，1970年初就开始了“一打三反”运动。如果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主要整老师，那么“一打三反”运动主要整学生：抓“反动学生”。在南开大学：“1970年2月，春节刚过，有一天晚上，工宣队负责人从驻腰山村的校总部回来，刚进门就嚷起来，大意是说：我们又要搞运动了，运动的重点是抓反动学生。校工宣队总部已经在中文系、外文系搞了试点，破获了几个反革命小集团”“历史系被抓的反动学生有10多位，在总共只有百余名的学生中比例并不低。但相对其他系来讲，还算温和。像中文系、外文系抓了几个反革命小集团，涉及的面就广了。1970年夏天，所有的在校学生都已毕业，我却还看见中文系和外文系的那几个‘反革命’在劳动改造，有时扫厕所，有时拔草，脏活、累活总少不了他们。”[68]

天津大学也是如此：“1970年，我们临近大学毕业时，四人帮在天津大学里搞起了整学生的运动，批斗了一批反动学生。”“在临近大学毕业时，确实有部分同学，为了毕业分配能分到好的地区，好的工作岗位，而昧着良心，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上线，下了狠手。”据说，天津大学打击反革命学生的运动，就是因为出现了多位同学自杀，才被迫中途紧急刹车的。[75]

文革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汇报说，在天津文革期间错杀的28人中，1970年判决的有22人。

和“一打三反”运动同时开展了“清查五一六集团分子”运动。“南开大学的‘516’嫌疑分子没有不办‘学习班’的，即专案审查。实行24小时监管，吃饭、去厕所都有‘看护’，整夜亮着灯。”[68]

据说“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反周恩来的，所以南开大学“卫东”1967年的“伍豪事件”当然成为重点。此事现在仍然讳莫如深，仅在魏宏运的文章里简单提到[10]。他列举南开大学文革里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时，有如下内容：

“张国忠，化学系学生，卫东红卫兵的二把手，被隔离审查，割断肠子而死。”

“张喜福，河南人，父子二人均为铁路工人，哲学系讲师，卫东红卫兵总部负责人之一，坐牛棚、审查，有人认为将其打死，最后被投入地下粪坑而死。其穿的鞋子放在臭水沟旁，因为撬开下水道井盖，必须用一铁器，手是搬不动的。而且井口很小，他的身体又高大，是谁下的毒手，一直是个谜。全校都为这一冤案叹息。”

“卫东”第二把手张国忠，就是随第一把手周少华赴京向戚本禹汇报“伍豪”事件的那个学生。直到现在，舆论还认为这一事件是江青、戚本禹故意陷害周恩来，何况在全国一片肃杀、草木皆兵的1970年！完全可以想象张国忠受到什么样的折磨导致他自己割断肠子而死。张喜福案，也几乎可以断定发生在这一时期。这样一件惨案，至今对社会无任何交代，究竟说明什么问题？

从批陈整风到批林整风

陈伯达对天津独有情钟，在1970年6月和8月先后来到天津。6月那次去了天津碱厂和玻璃厂、半导体厂视察。这两次来津，他都谈到工业问题，特别谈到单晶硅问题，和此期间他在北京首钢谈的一样，都是在贯彻他的“电子中心论”。去玻璃厂视察，是因为北京的玻璃总厂在搞单晶硅，他鼓励这边也搞。

陈伯达重视电子工业确有预见性，但是这种领导人指令性的科研有它的缺陷，就是一些地方领导不管客观条件，机械执行领导的指示，不可能取得任何正面效果[76]，和此期间笔者在陈伯达推动的“首钢自动化”中所感受的一样。

陈伯达在天津的活动到此为止，因为他随后在1970年8月23日开幕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倒了台。11月16日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并决定开展“批陈

整风”运动。根据毛泽东指示，12月12日召开华北会议批判陈伯达。李雪峰、解学恭、刘政在会上都作了检讨。

在“批陈整风”运动中，因为胡昭衡与陈伯达交往较多，市委决定将其军事监护，专案审查。1971年2月3日，为了贯彻华北会议精神，天津市革委会核心小组和警备区党委召开了批陈整风会议。会议前段批判陈伯达，后段解学恭作检查。检查内容一是庐山会议华北组简报问题，二是跟随陈伯达到华北各处视察。

据王辉透露：“当时在清查陈伯达家时，发现有解学恭写给向陈汇报天津‘文革’的材料。因为解学恭来天津时，周曾告诉解工作上要找陈伯达请示汇报。周恩来知道情况后，立即通知让解作检查，以求得主动，解写了检查上报，周看后不满意，让纪登奎派其秘书来津尽快帮助修改。纪登奎的秘书来津加了个夜班完成了任务，保解学恭一时过了关。”
[3]

4月15-28日，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天津市解学恭、刘政参加。周恩来代表中央对这次会议作了总结，在总结说陈伯达在天津使用几个坏人，并点了江枫、胡昭衡、王亢之、方纪、李树夫的名字。从此以后，天津就称这几个人为“江湖王方李”。其中李树夫为市委工业部副部长。这几个人与陈伯达也就是工作上的来往，彼此间也无特殊关系。据王辉分析，周恩来此说的根据是市里的汇报。此“江湖王方李”案又株连的一大批干部。
[3]后来陈伯达被算作“五一六”的总后台，所以这几位后来又成为“五一六总后台的死党”，印发了他们的“罪行材料”。

谢燕的文章认为是李雪峰揭发的：“李雪峰同志揭发陈伯达，在他离京赴津前夕，陈伯达曾对他说：天津的党政领导干部中，江枫、胡昭衡、王亢之、方纪、李树夫等五个同志可以使用。他到天津以后，确曾按照陈伯达的意见，秘密找这五个同志谈过话，鼓励他们准备站出来工作。但是，现在，陈伯达垮台了，李雪峰同志的口气也改变了。他按照‘江青2.21讲话’的腔调，将这五个同志说成是‘陈伯达在天津包庇的一小撮坏人’。”[49]

1972-1973年，天津市委结合批判陈伯达，对小站地区“四清”运动进行一次复查和

平反，恢复了一些错误处理发干部和党员的职务和党籍。文革后，又对三个“反党集团”等案予以彻底平反。

在“批陈整风”期间，天津市革委会核心小组根据中央指示准备成立新的市委。1971年2月初两名天津驻军负责人和王曼恬联名上书中央要求罢免解学恭，虽中央没有批，但说明领导集团很不团结。1969年66军司令员郑三生和政委杨银生调走后，原来主管支左的副军长刘政升为军长，原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池必卿调天津任革委会副主任。给中央写信的肯定有刘政在内。

1971年天津市提拔了两位劳模，色织四厂的蔡树梅和第一机床厂的张福恒任革委会副主任。这两位劳模领导，除去开开会举举手以外，“既不起好作用也不起坏作用”，完全是个摆设。1970年还提拔了天津内燃机厂的孙健为市委常委，1974年任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

驻军占房事件

1972年7月2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一个文件中发1972年[28]号，即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北京军区、六十六军、天津警备区党委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整顿军队纪律，纠正不正之风的报告，并转发新华社天津分社写的四篇内参，第一篇内参题为《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第二篇是天津驻军领导人对此事的自我批评，第三篇是反映驻军退出民房的情况，第四篇是写退房后军民关系改善。后三篇反映的情况是中央看到第一篇稿件后采取纠正措施的结果。这个文件在中共中央转发内参的按语中要求天津驻军迅速改正错误，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一条当时称为“最高指示”（即毛泽东的指示），指示的大意是解放军驻锦州部队在一个苹果园里不吃园里的苹果，说不吃是光荣的，吃是可耻的。毛泽东旁敲侧击，用吃苹果的事来说明军队占用民房可耻，退房子光荣。

发表在《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上杨继绳的文章《内参引发的军队大搬家》[77]，说的是1972年，该文作者等人写了一份内参，揭露天津驻军大量侵占民房，被中央以文件

形式下发，迫使军队退出民房的事件。

当时的情况是很严重的：“名医杨济时重庆道187号一所小楼13间房，被警备区一位副参谋长一家占领，杨济时一家20人被赶到重庆道6号地下室一间房子。睦南道83号是著名肿瘤专家金显宅的私宅，被警备区一位领导人家庭占用。市政协委员李勉之兄弟三人在睦南道94号的三幢小洋楼和整个院子都被军队占用。市政协副主席毕鸣岐在大理道63号的一所私宅被05部队占用。市政协委员、民主建国会负责人乐肇基睦南道56号私宅被一位军官家庭占用。市政协委员、名医施锡恩睦南道89号一所私宅被‘兵要组’占用……”

“大理道义胜里6号是姓郑的私宅，4688部队一位团级干部，还是学毛著积极分子，他先占了楼上一层四间，姓郑的被迫住楼下一间。后来这个团级干部说‘我不跟资本家住一个楼’，就把姓郑的赶走了。”

“……多家医疗单位被占。如有700张病床的第二工人疗养院（柳林）建筑面积两万平方米，被北京军区后勤部八分部占用。有120张病床的第一工人疗养院郑州道分院，被警备区占用。河西区尖山那所两万多平方米的大医院被天津警备区全部占用。当时天津病床紧张，全市有12万结核病人，只有两三百张结核病床，军队占用医院很不得人心。”

天津师范大学，当时叫东风大学，“八里台的整个校园3.626万平方米的建筑都被六十六军军部占用（六十六军占用后又在校园内建了4800平方米房屋和两个地下指挥所）。 ”

部队侵占老百姓利益问题不仅反映在占房上，当时一些部队利用支左之便，在经济上侵占国营或集体制单位的利益现象亦普遍发生。1972年批林整风会议期间，解学恭于6月15日返回天津。在他日记中记载：“十一时半至下午一时，同许诚、国柱、曼恬同志谈了批林整风会议情况。并谈了天津警备区把一个全民所有制工厂改为部队所有制；利润自己分配，不上交国家；利用职权挪用电讯局资金用于小团体；私自招收工人等违犯原则和政策的严重错误，并建议警备区常委开会，无偿退还工厂。” [78]

虽然整个北京军区侵占民房的事件都很严重，但有代表性的是天津。为什么是天津呢？夺权阶段以后，掌权的是“三结合”的革委会。在天津市的革委会中，始终未遴选出一位

群众组织代表的副主任，只提拔了几个劳模摆样子。高校造反派中未能涌现出能与中央首长讲得上话的领袖人物。在工人中，中央文革原来垂青于张承明，但张受到高校造反派的反对，后来又投靠了“大联筹”。所以天津群众组织的力量始终分散、不团结，不具有和军方抗衡的力量。地方干部呢？“万张集团”案牵连了一批干部，“二二一讲话”打倒了几个已结合进革委会的干部，“批陈整风”后又整出个“江胡王方李”案。在革委会里，只剩解学恭一个地方干部了，且受到军方的排挤，革委会成了不受约束的军方专政机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这里得到绝对的印证。

江青和小靳庄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以后，江青八次来津，其中有几次是来“休息”的，其余几次从事政治活动，特别是，选中了天津郊区宝坻县小靳庄这个“点”。

当时天津市委对这个“批林批孔”运动跟得很紧。他们下力气研究“儒法斗争”史，鼓吹工农兵要当“评法批儒”的主力军，指定南开大学主办“儒法斗争”史学习班，组织天津站工人参与编写、宣讲“儒法斗争”史。

江青知道这个情况后于1974年6月16日带领迟群、谢静宜等人来津。19日她参加了天津站工人宣讲儒法斗争史大会，并发表了关于儒法斗争的讲话，声称“两千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她还宣布天津站是她的“点”，她要通过抓这个点，推动全国的批林批孔运动。因为她还要抓一个农村的“点”，市委向她推荐了宝坻县林亭口公社小靳庄大队。于是江青在22日访问了小靳庄，参加社员举行的批判会，并将其树为“无产阶级占领意识形态”的先进典型，使其名扬四海。

小靳庄是宝坻县学大寨的四个典型之一，因办“政治夜校”而被江青看中。这件事有些地域文化的背景，因为据说这个地方的农民比城市里的人表现得还文明。原来还比较贫困，后来在支部书记王作山领导下，生产得到发展。这位书记还独出心裁，举办政治夜校，唱样板戏，有业余文化娱乐的性质，得到江青的青睐而被选中作为榜样。江青还与这一年

的9月2日偕同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再次访问小靳庄。地震后的1976年8月28日她又第三次访问小靳庄。

后来出了《小靳庄诗歌选》。其代表作例如老贫农魏文中的诗：“林彪喊‘复礼’，我的心中怒火起：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我从十岁当奴隶，忍饥挨冻受打骂，泪成河呀伤遍体。伟大领袖毛主席，把我救出活地狱，林彪妄想搞复辟，坚决和他斗到底！”

1976年的风波

1976年中国政局波谲云诡。天津市委竭力跟随，不敢怠慢，却总是进退失据。

首先遇到的是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的规格问题。市委当时专门派人赴京考察，回来后制定了六条关于群众如何进行悼念活动的意见。却不料在传达这六条意见的当晚，却接到周的治丧委员会办公室的电话，说：“各地不组织吊唁、开追悼会、戴黑纱等活动。如群众自发地组织各种吊唁活动，可以做好说服工作，化悲痛为力量，以实际行动吊唁周总理。”市委也只好照样传达。1976年2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孙健的秘书打电话来说，3月的《中国妇女》杂志因印有周总理的照片，被中央领导同志批评，撤下来了，请天津注意一下。于是天津也从一些刊物上撤下周的照片。

4月初，北京天安门事件那几天，在天津也发生送花圈事件。大致是群众白天往中心广场送，政府晚上收。没发生重大冲突事件。

这一年初，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但一开始未点邓的名。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社论，提出了“风源”问题。解学恭等天津市领导感觉这是个重大问题，于是派王曼恬等人去北京清华大学等地摸底。王曼恬回来说，天津已经落后了，于是这些人决定抢先点名批判，写了个点名的《关于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批判右倾翻案风的报告》，于2月12日报送毛泽东、党中央。

7月28日唐山地震波及天津，以宁河县最为严重。全市重伤21497人，死亡24296人，受到严重破坏的房屋6300万平米，占原有房屋面积的61%。经济损失也比较严重，特别是

塘沽的重化工业。笔者当时去了天津，感觉社会秩序尚良好，但据说不论政治案件和刑事案件都较上月上升了30.2%。

10月，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英明领袖”华国锋上台，天津市委继续背运。因地震时的8月4日，华国锋率中央慰问团来津慰问。市委书记徐信根据中央办公厅的“不夹道欢迎”指示，说接待工作中要“掌握分寸”、“不冷不热”。

这几件事，特别是抢先点名事，后来在“揭批查”中都成为天津市委，主要是解学恭的罪状。他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这种严厉处分在文革中掌权的地方官员中很少见，据说原因是他在上面没有后台，无人替他说话。

天津市委再次解体。所有台上干部无一幸免。巴木兰这样的老干部、徐信这样年轻有为的新干部，全都被开除党籍。一些造反起家的都被判刑。林启予和其他一些原来五代会的被判十年徒刑。而原来“大联筹”的，因为没掌权，多被判处五年。“大联筹”领导之一、最早造反的张承明因保护张淮三有功，没被处分反倒当了个小干部。 ■

附录：

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

[1]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天津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

[2]《天津通志大事记》，天津地方志网，地方文革史交流网

[3]王辉《天津文革亲历纪事》，兰台出版社，2013

[4]王辉《天津文革中的“二·二一事件”》《炎黄春秋》2011年4期

[5]王辉《江青八次到天津》，《炎黄春秋》，2013年1期

[6]王辉《我起草天津小站四清报告》，《炎黄春秋》，2014年1期

[7]王端阳《一个红卫兵的日记》，网络版

- [8]王林《王林日记》，网络版
- [9]林启予《天津文革片断》，网络版
- [10]魏宏运《南开大学文革往事》，《炎黄春秋》2014年4期
- [11]魏宏运《1966年南开大学八七开花纪实》，《历史学家茶座》32辑，王兆成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
- [12]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天翻地覆慨而慷——记南开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8
- [13]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
- [14]杜钧福《我们的使命》，作者博客，2015
- [15]杜钧福《天津文革中的三轮二社事件》，作者博客，2015
- [16]杜钧福《读天津文革亲历纪事》，作者博客，2015
- [17]佚名《最真实的1958-1967 天津划归河北省那些年》，百度贴吧城市gdp吧，2014
- [18]谢燕《陈伯达和天津“文化大革命”》，夕阳晚晴，2014
- [19]罗力《文革初期天津十六中事件始末》，马蹄湖博客，2007
- [20]陈德仁、谢燕《万晓塘的最后岁月》，夕阳晚晴，2014
- [21]天津市战斗区中学联络员革命造反派《天津市战斗区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地方文革史交流网，2010
- [22]李中垣《八十述往》，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 [23]牛奔《在大学里文革中是如何分成两大派的》，作者博客，2015
- [24]shukanhuang《大学生活的回忆》，作者博客，2007
- [25]清风《往事追索》，作者博客，2007
- [26]天津毛泽东主义战校毛泽东思想红旗红卫兵《天津市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问题一百例》，1966年12月5日印发，地方文革史交流网转载，2010
- [27]仝凤泽《忆“文化大革命”对塘沽区财贸工作的冲击》，百度贴吧，2010
- [28]陈再道《陈再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9

- [29]佚名《我眼中的66年夏季》，老三届社区，2003
- [30]陈中平《穿越历史的急流险滩》，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
- [31]林希，《恩怨》，《那个年代中的我们》，者永平主编，远方出版社，1998
- [32]张刃《孩子眼中的文革岁月》，《炎黄春秋》2010年3期
- [33]赵淮青《文革北大有多少教授学者因不堪忍受屈辱自杀》，人民网，2012
- [34]许恩荣《征途》，网络版，2010
- [35]《塘沽历史年表》，塘沽记忆吧，2013
- [36]杨继绳《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 [37]陈风雨《青春记忆》，风雨男人博客，2005
- [38]李建华《张大爷和张爷爷在文革时的遭遇》，作者博客，2013
- [39]大庆《文革初期的混乱》，大庆的博客，2013
- [40]李振铎《梦之乡》，健之博客，2010
- [41]大庆《造反组织遍天下连载（1）》，作者博客，2013
- [42]佚名《往日烟尘——那十年蹉跎的1001个瞬间》，美国中文在线，2004
- [43]北斗星空《四十年前文革的remember》，作者博客，2007
- [44]周恩来1966年10月31日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座谈纪要
- [45]孟庆丽《天津耀华中学（十六中）“文革”亲历回忆录》，肖恩的博客，2014
- [46]《陈中新时世实示之窗口10-12》，天津一中66高三四的博客，2013
- [47]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
- [48]王辉《半瘫痪的工作会议》，《今晚报》2004年11月27日
- [49]谢燕《“江方王胡李”是一起冤案》，夕阳晚晴，2014
- [50]牛奔《六七年的“一月夺权和河北大学的夺权斗争”，作者博客，2015
- [51]陈伯俭《42年前我见过毛泽东》，作者博客，2008

- [52]谢富治 1967 年 3 月 20 日接见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代表时的讲话
- [53]李近川《“文革”中几件要事的起因》，肖健卿、李近川主编《飞鸣镝——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见闻录》，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1
- [54]董保存、卜算子《天津延安中学复课闹革命始末》，《党史博览》2006 年 11 期
- [55]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批转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及附件，宣讲家，2009
- [56]周恩来 1967 年 2 月 18 日接见财贸口部长、司局长干部会上的讲话
- [57]牛奔《解放军支左又起波澜》，作者博客，2015
- [58]索翁轩《文革中的回民支队》，作者博客，2015
- [59]相振勤《一名老知青的纪实回忆录》，北大荒之情网，2016
- [60]李建华《文革时的天津钢厂 728 武斗》，蔚蓝的海博客，2012。按此文说武斗发生在 1968 年 7 月 28 日，估计应为 1967 年 7 月 28 日。
- [61]刘晋峰《峥嵘岁月——刘晋峰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 [62]《风云无边——于桑纪念文集》，转引自晋西琳临的博客，2012
- [6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64]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
- [65]郑维山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材料之四，宣讲家，2012
- [66]林希《百年记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
- [67]中共石家庄地委办公室、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整理《一个红卫兵抓“叛徒”的回忆》，《上访通讯》编辑部编《春风化雨集》上，群众出版社，1981
- [68]刘泽华《我在“文革”中的际遇》，《炎黄春秋》，2011 年 12 期
- [69]佚名《工宣队进驻南开大学，红卫兵挨整》，枫网，2013
- [70]佚名《天津大学校史》，《原天津大学教授、校长张国藩纪念馆》，2009
- [71]龙人《惨酷的劳改与殴打》，jsliu04 博客，2014

- [72]蓝英年《且与鬼狐为伍》，360doc 个人图书馆，2015
- [73]牛奔《大联合和成为校革命委员会委员》，作者博客，2015
- [74]李春霖《文革中见闻》，塘沽老干部网，2010
- [75] qiaosang《大学时代（四十九）难忘 20 岁之二》，作者博客，2012
- [76]郭功焯《硅粉之争——“支左”反思之五》，老郭的风雪人生博客，2008
- [77]杨继绳《内参引发的军队大搬家》，《炎黄春秋》2011 年 3 期
- [78]解学恭《批林整风汇报会日记》，《炎黄春秋》2015 年 7 期■

【本刊声明】

本 刊 声 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方惜辰

本期封面：邹行